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目 录

我之节烈观	(1)
斩断束缚妇女的极大绳索 ——读《我之节烈观》	(17)
现在的屠杀者	(20)
揭破“现在的屠杀者”的险恶用心 ——读《现在的屠杀者》	(22)
未有天才之前	(25)
必须正确对待新生事物 ——读《未有天才之前》	(32)
春末闲谈	(35)
“麻痹术”挽救不了反动派的灭亡 ——读《春末闲谈》	(45)
十四年的“读经”	(48)
对骗子们的致命一击 ——读《十四年的“读经”》	(56)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59)

刺向“中庸之道”的锋利匕首 ——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73)
有趣的消息	(76)
警惕骗子的骗人伎俩 ——读《有趣的消息》	(86)
一点比喻	(89)
“豪猪的刺”和“野猪的牙” ——读《一点比喻》	(94)
老调子已经唱完	(97)
警惕“软刀子” ——读《老调子已经唱完》	(107)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10)
评曹斥蒋 借古“慨”今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43)
述香港恭祝圣诞	(147)
中外反动派串演尊孔丑剧的真相 ——读《述香港恭祝圣诞》	(153)
革命文学	(156)
根本问题是做“革命人” ——读《革命文学》	(160)

文学和出汗	(164)
回击“人性论”的第一枪 ——读《文学和出汗》	(168)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72)
“人性论”的彻底破产 ——读《“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202)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207)
透过假象 看清实质 ——读《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212)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15)
革命作家必须投身实际斗争 ——读《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25)
答北斗杂志社问	(228)
发扬无产阶级的战斗文风 ——读《答北斗杂志社问》	(230)
论“第三种人”	(233)
“一个心造的幻影” ——读《论“第三种人”》	(241)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 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245)

彻底剥掉“中庸之道”的画皮 ——读《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 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254)
华德焚书异同论	(257)
秦始皇的历史功绩 ——读《华德焚书异同论》	(261)
谚 语	(264)
反动谚语必须批判 ——读《谚 语》	(268)
礼	(272)
“礼治”的反动实质 ——读《礼》	(275)
吃 教	(278)
“天经地义”的可耻下场 ——读《吃 教》	(281)
《伪自由书》后记	(284)
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 ——读《〈伪自由书〉后记》	(327)
野兽训练法	(330)

撕开“仁爱”的虚伪面纱 ——读《野兽训练法》	(333)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王道”是“霸道”的亲兄弟 ——读《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336)
算 账 现在是算这笔账的时候了！ ——读《算 账》	(351)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戳穿反动派尊孔的骗局 ——读《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357)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讨伐“孔家店”的战斗檄文 ——读《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61)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经验 ——读《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364)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宣言书 ——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375)
	(379)
	(382)
	(386)
	(393)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397)

反潮流的革命大无畏精神

——读《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 (420)

死 (424)

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

——读《死》

..... (432)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436)

一面历史的镜子

——读《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 (444)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448)

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进击”

——读《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 (455)

后 记

我之节烈观^①

“世道浇漓^②，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③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④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⑤才好，陈独秀^⑥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⑦。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⑧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⑨！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

设法自戕^⑩，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⑪，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账；所以种种黑

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的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

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⑬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

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象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

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⑭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⑮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⑯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象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

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⑰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⑱，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⑲，“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⑳，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㉑，甚而至于钱谦益^㉒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

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②③}，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②④}，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②⑤}的影响；不述而作^{②⑥}，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

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㉔的平和话，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

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②⑧}，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期，署名唐俟。后编入《坟》。

②浇漓，轻薄、不淳厚的意思。

③御，封建时代对皇帝的敬称；那时臣子或文人把著作献给皇帝阅览，叫做“进呈御览”。

④针砭（biān边，是古代用以刺肌肤治病的石针），原意为用金针和石针刺穴位治病，引伸为规劝过失。

⑤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当中国进入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时，他站在敌对立场，代表保守、反动势力，坚持改良主义，组织保皇党，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抗。一九一六年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主张在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一九一七年他又勾结北洋军阀张勋，扶持退位的宣统帝溥仪复辟，并发表《共和平议》及《致徐太傅（徐世昌）书》两文，攻击“民主共和”，主张“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著有《中庸注》、《论语注》等书，狂热地宣扬孔孟之道。

⑥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五四”时期主编《新青年》杂志。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被选为总书记，后堕落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大革命失败后，他与托派相勾

结,拼凑反党小集团,形成“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⑦一九一七年十月,俞复、陆费伯鸿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轲矣乎”等胡言乱语。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和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丛志》等文章,驳斥他们的谬论。

⑧《新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刊的月刊,一九一七年迁北京。在“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时期起过重要作用。鲁迅曾参加《新青年》的编委会工作,他这时期的许多作品,大都在该刊发表。因为买办文人胡适企图改变该刊的性质,编辑部于是改组。一九二一年迁广州出版,一九二三年六月改出季刊,一九二六年七月停刊。

⑨辛亥革命后,政权为代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北洋军阀所篡夺。他们反对民主改革,提倡“读经尊孔”,民国初年颁布的“褒扬条例”中,仍有“表彰节烈”的条款。直到“五四”运动时期,报纸上还经常刊登表扬“节妇”“烈女”的纪事与诗文。“君政复古时代”,指袁世凯策动帝制运动和实行帝制的时期。“君政复古”一词,见袁世凯御用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的《君政复古论》一文(载一九一六年一、二月《中国学报》第一、二期)。

⑩自戕(qiāng腔),即自杀。

⑪略述原情,撇开表面上的事实,从情理上加以原谅。

⑫夫(fú扶),文言虚词,表示感叹语气。

⑬指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的《贞操论》,译文载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文中列举了人们在贞操问题上的种种互相矛盾的观点与态度,指出男女在贞操问题上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贞操不应作为道德一律实行。

⑭业儒,以儒为业的人。在孔孟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之后,读书人一般都崇奉孔孟学说,自称业儒;鲁迅在这里是

指那些顽固地提倡和维护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⑮这是宋代反动理学家程颐的话：“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

⑯重适，即再嫁。

⑰“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是元代诏书上习用的蒙古语的汉译，即“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代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简称徽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徽号，“聪明天纵”的意思。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徽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徽号，“杰出”的意思。

⑱讳(huì会)，此处作隐瞒解。为尊者讳，就是替帝王将相或尊长隐瞒丑事。

⑲科举(封建考试制度)时代应试及格而取得“秀才”、“举人”等资格，称为“功名”。有“功名”的人因行为不端或其他罪名而被取消这种资格时，称为“斥革功名”。

⑳封建统治者往往称农民起义军或敌方的军队为“逆兵”，称自己的军队为“天兵”(天朝的军队)。

㉑“双烈”一类的事，常见于旧时各地的府县志中。“七姬墓志”，指《七姬权厝志》(厝，cuò措，置棺于其中的意思)，明代张羽作。志中载元末明初潘元绍被徐达打败后，怕他的七个妾被夺走，便逼她们一起自缢；死后合葬于苏州。

㉒钱谦益(1582—1664)，明代进士，任礼部侍郎，后谄事南明宰相马士英，官至礼部尚书。清军进入江南，他首先投降，因此为人所不齿。清乾隆帝下令于国史增列《贰臣传》时，把他列入其中。著作有《初学集》、《有学集》等。

㉓语见《说文解字》卷十二：“妇，服也。”这句话表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妇女的压迫和蔑视。

㉔这里所说的说部书(笔记、小说之类)，大概是指《壶天录》和《右台仙馆笔记》等，其中有下文所引的一类故事。

㉕语见《说文解字》卷八：“儒，柔也。”柔是温和谦让，不反抗

的意思。

②⑥《论语·述而》载有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意即只转述前人的话，自己不加发挥和创作。孔丘在这里强调他从事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工作仅是传述先王的旧作，没有自己的创造，典型地表现了他“法先王”、坚持奴隶制的复古思想。后来“述而不作”，以述为作，就被因循守旧的儒家奉为古训。在他们看来，不述而作，就是违背古训。

②⑦室女，未嫁的女子。室女在已订婚未出嫁时，因对方死亡而终生不嫁或以身殉的封建道德，明清间有几个进步思想家曾指出过它的不合理，如明代归有光在所著《贞女论》中对此就表示过异议；清代汪中也曾著文申述了归有光的意见。后来俞正燮作《贞女说》，也对此表示反对。

②⑧旌(jīng精)表，即表彰的意思。封建时代帝王给所谓忠孝节义的人建坊题额以示表彰，叫做旌表。

斩断束缚妇女的极大绳索

——读《我之节烈观》

《我之节烈观》是一九一八年鲁迅用白话文写的第一篇声讨孔孟之道的战斗杂文。它用浅近的道理，锐利的笔锋，一层一层地剥开杀人不见血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外衣，深刻地剖析了所谓“节烈”的反动实质和反动统治阶级玩弄“表彰节烈”骗局的险恶用心，对残酷迫害妇女的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五四运动前夕，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当时，北洋军阀纠集封建顽固势力，竭力宣扬孔孟的礼教，拚命提倡忠孝节义。他们编造了一套蛊惑人心的鬼话，说什么在“人心不古，国将不国”的世道里，把丈夫死后不改嫁，遇到强暴便自杀的“节烈”女子“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鲁迅痛斥了这种“节烈救世说”的荒谬和恶毒，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表彰节烈”，只不过要“女人上当”，为反动统治装饰门面罢了。鲁迅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摧残妇女的节烈观，在旧社会能够长期存在？原因无他，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要女人守节。自从宋朝那一班“业儒”编造出“饿

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怪论以后，这种“畸形道德”便“日见精密苛刻”，广大劳动妇女也就被打进人间地狱，被踩在社会最底层，甚至被迫用生命去换取贞节牌坊，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翻开满篇“仁义道德”的孔孟说教，哪一页不浸透了妇女的斑斑血泪！鲁迅从“节烈”的发生到被反动统治阶级顽固推行的过程，指出了“表彰节烈”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彻底戳穿了所谓“节烈”的反动本质。

鲁迅以革命的激情和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满腔义愤，强烈要求“除去虚伪的脸谱”和“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强烈要求“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痛苦”和“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对传统的孔孟之道，表示了彻底决裂的态度。

解放以后，我国广大劳动妇女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地起来斩断束缚在自己身上的这条极大绳索，叫鼓吹“节烈”之类的昏迷和强暴者们统统见鬼去了。可是，林彪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却接过孔老二的衣钵，妄图把这条极大绳索，重新束缚在广大劳动妇女的身上。他们胡说什么“忠孝节义”“可用其内容”，“忠孝节义”“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更加无耻的是，他们竟然公开鼓吹什么“自己丈夫的命运决定我们自己及孩子的政治、生活命运”等等，妄图用孔孟之道作为反革命的思想武器，继续奴役和压迫妇女，使妇女成为不问无产阶级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庸人，重新用“夫权”这条极大绳索，把顶得半边天的广大妇女束缚起来，以便他们从根本上改变党的

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中国革命的胜利给劳动妇女带来了新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为广大妇女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前，在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新中国的妇女更是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积极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战斗行列，用自己的斗争实践来创造和巩固鲁迅当年发愿要使劳动妇女都享受“正当的幸福”的日子。

现在的屠杀者^①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②。”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③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④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⑤，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后编入《热风》。

《新青年》杂志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对于社会和时事的短评，总题为《随感录》；最初各篇都没有单独的标题，从第五十六篇起才在总题之下各标题目。鲁迅在《新青年》发表这种短评，是从一九一八年九月第五卷第三号，即从《随感录》第二十五篇开始的。到第五卷为止，《新青年》在《随感录》的总题目之下共发表了一百三十三篇短评，其中有二十七篇是鲁迅写的。本篇序号为“五十七”。

②鄙俚浅陋，形容粗劣庸俗。识者，有见识的人。哂（shěn审），微笑。“不值识者一哂”，即不值得有见识的人一笑的意思。这是当时复古派林纾之流攻击白话文的胡说。后面加上“之者也”，便成为一句不通的文言文了。鲁迅用以讽刺那些鄙视白话文的复古派，其实文言也是写不通的。

③文，掩饰。“自文其陋”，掩饰自己的浅薄。这也是复古派攻击提倡白话文的人的胡说。

④《镜花缘》，清朝李汝珍所作长篇小说。这里所引酒保（酒店伙计）的话，见该书第二十三回《说酸话酒保咬文》。君子国即书中的淑士国。

⑤勒派朽腐的名教，勒派，强迫命令实行；名教，指封建教条。因为孔丘说过“必也正名乎”的话，封建统治者便强调“因名设教”，把儒家的生活规范称为“名教”。

揭破“现在的屠杀者”的险恶用心

——读《现在的屠杀者》

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杂文《现在的屠杀者》，是一篇声讨封建复古主义者妄图扼杀革命的新生事物、倒转历史车轮的战斗檄文。

当时，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的斗争，空前激烈。白话文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日益深入人心，白话文刊物风行全国，这时，以林纾为代表的一帮封建复古主义者，就象“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嗡嗡地叫个不停。他们恶毒污蔑新生的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鄙俚浅陋”，“不值一哂”；疯狂叫嚣“古文不当废”。他们如此仇视白话文，是因为他们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看到以白话文形式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深挖他们封建统治老根的“覆孔孟，铲伦常”的革命运动。他们反对白话文，其实也就是反对革命。

鲁迅一眼看穿了林纾之流诋毁白话，维护文言，反对社会改革，维护“孔孟之道”和封建阶级反动统治的罪恶目的。鲁迅认为，历史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什么都阻止他不得”。他指斥林纾一伙封建复古主义者是“现在的屠杀

著”。他们“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他们的险恶用心是“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鲁迅就这样从根本上揭穿了复古主义者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的反动实质。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封建复古主义者林纾这伙“现在的屠杀者”，不但没能把革命“杀”掉，反而被革命浪潮冲刷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全中国人民在这场革命中，不但反对了文言文，打击了“孔家店”，最后还推倒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五四”时期林纾之流尊孔复古的美梦早已成为历史的泡影，他们没能杀掉那时的“现在”，也就杀不了那时的“将来”，中国“现在”不是进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时期吗？但是，无数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旧的“现在的屠杀者”完蛋了，还会有新的“现在的屠杀者”出现。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就是这样的“现在的屠杀者”。他们为了“克己复礼”，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怕得要命，恨不得置诸死地而后快。社会上也还有那么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现在的屠杀者”的帮凶和吹鼓手，竭力反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提倡复旧。比如，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林彪反党集团不但

恶毒进行攻击，而且利用他们篡夺的权力，妄图把这些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当代的“现在的屠杀者”。他们的险恶用心也是鲁迅早已揭露的：“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这个“将来”，也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时代。林彪一伙的用心是多么险恶！所以，重读鲁迅《现在的屠杀者》一文，有助于我们认清“现在的屠杀者”反对新生事物、妄图复辟倒退的反动实质，特别是认清批林批孔这场斗争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而提高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和觉悟。

未有天才之前^①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艺术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②过Alps山^③，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

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④，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⑤。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

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⑥。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⑦，都介涅夫⑧，陀思妥夫斯奇⑨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⑩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象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

“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①，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②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

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象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注 释：

①本篇为鲁迅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的讲演稿，最初发表于该校《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时，前面加了一段作者的小引：

“伏园兄（即孙伏园，当时《京报副刊》的编辑）：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讲演，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夜，迅上。”后编入《坟》。

天才，指生而具有的才能，先天赋与的智慧，它是以孔丘的“上智下愚”、“生而知之”的天命论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无验论作为理论基础的。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都鼓吹天才

论，就是要突出个人的作用，否定群众创造历史，是为反动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天才不过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与生俱来的才智，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靠长期的革命实践，靠一个党，靠群众路线和集体智慧。鲁迅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对天才所阐述的观点，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

②拿破仑（1769—1821），即拿破仑·波拿巴，又称拿破仑一世，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杰出的代表。在他的领导下，粉碎了法国保皇党的复辟阴谋，先任法国执政，后称皇帝，强化中央集权，颁布了保卫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法典》。他先后指挥数十次战役，一次又一次击溃了以俄国沙皇为盟主的封建复辟势力“反法同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而成为震动世界的英雄人物。恩格斯曾经指出：“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德国状况》）但是他毕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军事行动必然带有侵略和扩张的一面。当革命在法国取得胜利后，他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欲望，加紧剥削劳动人民，镇压工人运动，以致人民群众很快脱离了他，大大削弱了他反封建的力量，使欧洲反动的封建君主得以联合起来，把法国的革命扼杀掉。一九一五年滑铁卢之役，战败被俘，后流放于圣赫勒拿岛。

③Alps山，通译为阿尔卑斯山，位于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之间，山势雄伟，为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一八〇〇年拿破仑统帅大军进入意大利，曾越过此山与俄军作战。

④乔木，高大的树木。

⑤“整理国故”，是五四运动时期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文人胡适所提倡的开倒车、钻牛角尖的反动主张。当时胡适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谬论之后，又提出“整理国故”，诱骗青年“踱进研究室”，埋头于故纸堆中，成为古人的俘虏，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鲁迅对此曾多次加以揭露和驳斥。

⑥“崇拜创作”，当时创造社个别成员有这种倾向，他们崇拜创

作，轻视翻译。有人借此“排斥外来思想”，故步自封，鲁迅对此也表示过异议。

⑦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作者。他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和抗议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资产阶级的罪恶；一方面却宣传非暴力主义，对宗教抱有幻想，妄图实现“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列宁对他作过全面的评价。

⑧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代表作有《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揭露了腐朽的俄国农奴制度、贵族阶级，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弱点。

⑨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等，他的作品，有力地暴露了城市贫富之间的矛盾，控诉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罪恶，但同时宣扬顺从和忍耐，醉心于病态心理的描写。

⑩彼得和约翰，是俄国人和英国人常用的名字。

⑪戕贼，摧残，伤害。

⑫寒噤，本于“噤若寒蝉”一语，喻为寒冬的蝉，不敢出声了。噤（jìn进），闭口。

必须正确对待新生事物

——读《未有天才之前》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一向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不惜用自己的血汗，辛勤地灌溉革命事业的新苗，他恳切地教导青年要和革命同一生命，参加革命实践，成为“勇敢而明白的斗士”。对于引诱青年走入邪道，摧残新生力量的旧势力，鲁迅曾一再加以抨击。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的讲演《未有天才之前》，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

在这篇讲演中，鲁迅坚决站在为革命扶植新生力量的立场上，针对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提出的“整理国故”的反动口号和文艺界出现的“崇拜创作”的伪善论调，特别是针对某些“不平家”指责青年“幼稚”、要求所谓“天才”的恶意批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鲁迅教导青年不要被那些国学家和“崇拜创作”论者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要识破他们的阴谋。鲁迅提醒道，胡适之流提倡“整理国故”，是妄图以腐朽反动的封建文化来抵制“新思潮”即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以此诱骗青年“埋

在南窗下读死书”，脱离革命斗争，以达到他们使“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让封建势力永远统治中国的罪恶目的。

鲁迅教导青年不要被那些恶意的批评家的嘲笑责骂所吓倒，要坚决顶住。鲁迅毫不留情地指斥这种“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其实是“在嫩苗的地上驰马”。他们不是要“天才”，而是要把新生力量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鲁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观。他深刻地指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他把天才和民众的关系比作花木和泥土的关系：没有民众，便没有天才，就象没有泥土，便没有花木。这就是说，“天赋的天才”是没有的，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靠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鲁迅在这里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他还用非常生动的笔调狠批先验论的天才观，指出：“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从娘胎里带来的“天才”，人的知识才能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从而指明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意义。鲁迅鼓励青年不要怕被人嘲笑为幼稚，他说：“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幼稚会生长、成熟、老成。鲁迅从发展观点看到新生事物的本质与主流，“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对青年

一代表现出满腔的热情，寄予无限的希望。

《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虽然是针对当时文艺界的问题，着重批判那种以“中国要天才”为幌子，恶意戕害文艺园地里的嫩苗的“批评家”。但是，鲁迅在这篇讲演中，提出凡新生事物“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却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我们对待一切新生事物的唯一的科学态度。

在鲁迅《未有天才之前》发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关怀培育下，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茁壮成长；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革命样板戏空前普及，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真正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当然，一切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成长、发展、完善的过程。我们应该学习鲁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满腔热情地为新生事物的成长大喊大叫，象鲁迅那样一辈子为培育新生力量殚精竭力。

春末闲谈^①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②。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③，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祝道“象我象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④里说：“螟蛉^⑤有子，果蠃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

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⑥，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象一个不知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⑦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⑧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⑨，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

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⑩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⑪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⑫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⑬，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醉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⑭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⑮；《二十四史》^⑯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诞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⑰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象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⑱，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象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

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①⑨}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②⑩}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③⑪}，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④⑫}，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⑤⑬}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⑥⑭}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⑦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⑧⑯}。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

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²⁷，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²⁸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²⁹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许多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

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⑩的怪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⑪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周刊第一期，署名冥昭。后编入《坟》。

②细腰蜂，昆虫名，体长约四分，色黑，头部球形，触角短而曲折，腰细。关于它的传种方法，在我国古书中有各种不同的记载。最早的记载即文中所引《诗经》的说法，见《小雅·小宛》篇：“螟蛉有子，果臝负之。”后汉扬雄《法言·学行》篇亦持类似说法。最先反

对以上说法的是六朝的陶弘景，他在注《本草·蠨蛸一名土蜂》条下说：

“(蠨蛸)虽名土蜂，不就土中作窠，谓搥土作房尔。今一种黑色细腰，衔泥于壁及器物边作房，生子如粟置其中；乃捕草上青蜘蛛十余置其中，仍塞口，以俟其子大而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竹管中，亦取草上青虫。一名果羸，《诗》云：‘螟蛉有子，果羸负之。’或言细腰蜂无雌，皆取青虫教祝，变成己子，斯为谬矣。”

③果羸，又作媠羸(guōluō果裸)，即细腰蜂。

④《诗经》，我国最古的一部诗歌集，被儒家列为经典著作之一。创作年代，大约从周初起，至春秋中期止。

⑤螟蛉(míng líng明灵)，一种绿色的小害虫，因果羸常捕捉螟蛉等小虫藏入窠里，留作将来幼虫的食物，古人误认果羸养螟蛉为己子，所以后来就把抱养的孩子(即义子)称为螟蛉子。

⑥遣暑林阴，即在树林荫处乘凉消暑。遣，消除。

⑦夷人，本来是我国古代奴隶主贵族和封建统治者对异民族的轻蔑称呼。这里指外国人。

⑧发勃耳(1823—1915)，通译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书。

⑨E君，指乌克兰童话作家爱罗先珂。鲁迅曾翻译过他的童话剧《桃色的云》及其他童话作品。

⑩“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见《尚书·洪范》。辟即天子或诸侯；玉食即珍贵的食物。意思是：只有天子或诸侯可以作威作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

⑪“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见《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君子，指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小人，指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

⑫“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见《孟子·滕文公上》：“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食(去声，sì四)，拿东西给人吃，即供养别人。意思是说：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劳心者是天生要统治

人的，劳力者是命里注定要被统治的。统治者应该由别人来供养，被统治者则应该供养别人，这是天下共同的道理。这完全是剥削阶级为其反动统治而制造的反动理论。

⑬卓然，高超。

⑭伦，即所谓人伦，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规定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称为五伦。伦又作类解，一伦即一类。

⑮“万年有道之长”，封建时代的臣民用来颂扬皇帝的话。意思是做一个世代相传、永不垮台的统治者。

⑯《二十四史》，我国封建社会的“正史”。清朝乾隆时辑印的二十四部史书，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⑰“特殊知识阶级”，一九二五年二月，北洋军阀段祺瑞为了抵制当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之下所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企图在这个会议上产生一个假的国民会议。当时竟有一批曾在外国留学的人在北京组织“国外大学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于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公园开会，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要求在并未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中给他们保留名额。请愿书中说：“查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者为一特殊知识阶级，无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鲁迅所批判的所谓“特殊知识阶级”，即指这类留学生，也就是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⑱“特别国情”，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时，他的顾问美国特务古德诺曾于八月间在《亚细亚报》发表《民主不适宜中国论》一文，胡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特别国情”的谬论，当时成为一切反动派阻挠民主改革

和反对进步思想的借口。

⑲“极峰”，意即最高统治者。当时有一些无耻的所谓学者曾用这种称谓去取媚北洋军阀。

⑳窃（qiè切），私自，暗中；旧时表示自谦的用词。

㉑进研究室主义，一九一九年买办文人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口号，妄图阻止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以后又提倡“整理国故”，要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诱骗革命青年“踱进研究室”，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破坏蓬勃发展的爱国学生运动。

㉒莫谈国事律，当时正是革命高潮时期，北洋军阀政府极为恐慌，派出大批特务钉梢追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致使很多茶楼酒馆都贴上“莫谈国事”的告白，以免惹祸。

㉓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语本《论语·颜渊》所记孔丘的话：“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凡是不符合周礼的事情，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讲，不要做；就是要人严格遵守奴隶制。鲁迅在这里揭露和批判当时某些所谓“教育家”对学生进行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说教。

㉔“礼失而求诸野”，见《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说：礼在都市里行不通了，就到乡下去推行。这是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到处碰壁的自我暴露。鲁迅引用这句话，是用来讽刺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帮闲文人，挖空心思寻找政治上、思想上禁锢广大人民的反革命手法。

㉕至道嘉猷，至，最高；道，理论；嘉，善、美；猷（yóu游），计划。至道嘉猷，即最高明的理论和最完美的计划。作者在这里作为讽刺的反语用。

㉖苍颉造字，夜有鬼哭，是古代荒唐的传说，见《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苍颉（jié洁），相传是黄帝的史臣，最早创造文字的人。雨，降下。粟，谷子，也是谷物的总称。

⑳反朴归真，语见《国策·齐策四》，即回到原始状态，还其本真的意思。这里是反语，讽刺那些复古主义者妄图把社会拉向倒退的荒谬想法。

㉑尼古拉二世，帝俄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的最后一个皇帝，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推翻，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七日被处死刑。中国旧时称皇帝逝世为“龙御上宾”，意即乘龙上天去了。

㉒“覆宗绝祀”，指皇帝宗室被推翻，皇家的宗庙也没有人祭祀了。

㉓《山海经》，我国古代的一部地理书，共十八卷，大约是公元前四世纪至二世纪间的作品，其中保存了不少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刑天”是《山海经》中的神名（刑，一作形），见《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牌；戚，斧；都是古代兵器。

㉔陶潜（372—427），字渊明，东晋诗人，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由于他不满当时的黑暗政治和官场虚伪，弃官归隐田园。所以这里称他为“隐士”。“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两句诗，见陶潜《读山海经》组诗第十首。意思是：刑天虽然失败了，仍然对人挥舞他的盾牌和大斧，他的勇猛精神是永世长存的。

“麻痹术”挽救不了反动派的灭亡

——读《春末闲谈》

《春末闲谈》是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前夕发表的一篇杂文。在这篇杂文里，鲁迅以细腰蜂对小青虫施用“麻痹术”作比喻，针对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尊孔读经、大肆宣扬孔孟之道的险恶用心，紧密地联系中外古今反动统治阶级兴亡的历史事实，热情地讴歌了人民“死也不肯安分”、不断奋起反抗剥削阶级血腥统治的革命精神，揭示了反动派“黄金世界的理想”绝不会实现的历史规律。现在读来，仍然使人感受到强烈的战斗气息，得到有益的启示。

题为“闲谈”，其实不“闲”。鲁迅写这篇杂文的矛头是直指所谓“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的。他首先假借乌克兰童话作家爱罗先珂之口，深刻地揭露了历代反动派总是想“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使他们的帝业千秋，代代相传。为此，这些统治者就竭力鼓吹“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孔孟之道，以此作为麻痹人民思想的“妙药”。这样，他们就可以

有一个广大劳动人民任由宰割，不事反抗，而剥削者得以实行“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的黄金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理想”，他们把孔孟之道当作细腰蜂那支神奇的毒针，妄图使人们被螫后变成小青虫那样，不死不活，永远听从他们的剥削、奴役、压迫和欺骗。这是什么“理想”？这是“吃人”的“理想”。但是，一切反动派的梦想终究是梦想而已。鲁迅指出，“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到头来，反动统治者总要被人民从宝座上掀下来，因为人民的反抗思想是无法扼杀的。鲁迅在文中特别引用《山海经》里一个头被砍断了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的故事，反复说明，不论是“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还是“特殊知识阶级”新发明的精神毒针，都不能使阔人的天下永久太平，他们的“黄金世界的理想”终归要化为可悲的下场。

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为了实现他的“黄金世界的理想”，不是也朝思暮想要得到那支可以麻痹人民思想的细腰蜂的毒针吗？他搬出孔孟之道那一套来，作为麻痹人民思想的毒针。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决不会任凭林彪一伙愚弄和摆布的。

鲁迅指出：“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反动派“日施手段，夜费心机”，想搞一支细腰蜂的毒针去毒害人民，结果总是枉然。即以皇帝之流来说，“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

林彪则还没有登上他的儿皇帝的宝座就已粉身碎骨、自取灭亡了。可见，什么“麻痹术”都挽救不了一切反动派灭亡的命运！

十四年的“读经”^①

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②。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③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这样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④ 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

不识丁的华工⑤！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载质”⑥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象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⑦；古可是要复到象清（即所谓“本朝”⑧），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⑨？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象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⑩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⑪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

以千里”了！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⑫，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⑬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⑭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武则天^⑮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⑯，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⑰。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

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诞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

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

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 (Elias Metschnikov) ①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大嚼细胞 (Fresserzelle)。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要扑灭这些，则须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他自己就实行着。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不提防临末又提到了一个俄国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卢布了罢。我现在郑重声明：我没有收过一张纸卢布。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掉了，是生了别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这问题无干。

十一月十八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猛进》周刊第三十九期。后编入《华盖集》。

经，古代称儒家、道家和佛教的著作为经（即被尊为典范的著

作)；本文所说的经专指儒家的典籍，如《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称“十三经”。

②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规定小学生从四年级起就要读经，引起舆论的反对。一部分人认为经是历史的材料，可以把它放到历史教学里去，主张“经固当尊”，经的名称“必不可存”。另一部分人又说经在历史材料里也不是重要的部分，反对“经固当尊”的说法；认为国外一些文科大学正在废除拉丁文为必修课，而中国却来提倡读经，那是复古，开倒车。

③二十四史，参见《春末闲谈》注⑩。

④《论语》和《易经》都是“十三经”中的经书。《论语》是一部宣扬孔丘反动思想学说的书，它的主要内容是孔丘言行的记录。《易经》则是古代的占卜书。孔孟之徒吹嘘经书有驱邪却敌的神力，所以鲁迅在这里加以讽刺。

⑤华工，指在外国做工的中国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曾有部分华工被招募去参加协约国对德国作战。

⑥“瞰亡往拜”，见《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赠送）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意思是说孔丘乘阳货不在的时候去拜访。“出疆载质”，见《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意思是说孔丘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他，他就焦急不安，一定要带上礼物出国，去见别国的君主了。鲁迅在这里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指出孔丘也是那种会耍“钻营，取巧，献媚”的“玩艺儿”的，而主张“读经”的阔人则是“别有用意”。

⑦颜回，孔丘的弟子；子思，孔丘的孙子；孟轲，就是孟子。朱熹（1130—1200），号晦庵，南宋徽州婺源（今安徽婺源县）人，是极力维护反动封建统治的南宋官方哲学代表，唯心主义理学家，孔丘反动学说的狂热鼓吹者。他编注的《四书集注》，被后代的封建统治者规定为尊孔读经的必读教科书。秦桧（1090—1155），宋代宰相、汉奸。王守

仁(1472—1528)，明代反动理学家。徐世昌、曹锟都曾任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统，前者是官僚，后者是军阀。

⑧辛亥革命后，一般遗老仍称前清为“本朝”。

⑨无怀氏、葛天氏是传说中我国太古时代的帝王；禹、汤、文、武、周公，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儒家为了宣扬复古思想，极力吹捧他们统治的时代是“太平盛世”。

⑩牖(yǒu友)，窗户。

⑪“人心不古”，是当时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不满或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复古的一些人的感叹语和口头禅。

⑫传说孔丘排行第二，故称“孔二先生”，这是对孔丘表示轻蔑的称呼。老聃(dān丹)，即老子，相传孔丘曾向他问礼，所以后来有人说他是孔丘的先生。“大著作”指他所著的《道德经》，即《老子》。其中有“将欲歛(xī吸)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话。意思是说：原来想这样干的，故意先反其道而行之。提倡读经的人们也是这样，挂的招牌是一回事，实际上是“别有用意”。

⑬“学而优则仕”，语见《论语·子张》，意思是学好了就可以做官。

⑭这是孟轲美化孔丘的话，见《孟子·万章下》，意思是合乎时宜的圣人；实际上孔丘是一个违反时代潮流的反动思想家。鲁迅曾将这话说译为现代语“摩登圣人”，有意加以讽刺。

⑮武则天(624—705)，名曩(zhào照)，唐高宗李治时立为皇后。李治死后，武则天摒弃过去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周，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称帝前后，掌握政权长达四五十年之久，当政期间，积极推行法家路线，打击儒学传统，反对守旧，坚持革新，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所以武则天虽然受到她所属的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仍然不失为我国封建社会时代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⑩多数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译；日本译作“过激派”，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曲解。

⑪这是讽刺政治投机分子。意思是说他们如果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会伪装革命，证明共产主义是符合于中国太古时代所谓葛天氏的“太平盛世”的；只因当时帝国主义势力还强大，所以他们敢于反对布尔什维克，诬蔑赞扬列宁的人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

⑫梅契尼珂夫（1845—1916），俄国医学家、生物学家。

对骗子们的致命一击

——读《十四年的“读经”》

《十四年的“读经”》，写于一九二五年底。这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未到来。那些被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吓破了胆，在高举着“新道德”和“新文学”两面文化革命大旗，向着“旧道德”和“旧文学”英勇进攻的文化生力军面前发抖的北洋军阀、走狗文人、封建余孽，在惊魂稍定之后，便猖狂进行反扑。这年十一月二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制定反动法令，规定小学生必须“读经”。复古派、保皇党、假道学们也日夜炮制“卫道”文章，祭起“尊孔读经”的黑幡，大造反革命舆论。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就是这样妄图用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来钳制人民的思想，抗拒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把被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冲击得庙毁祀断、声名狼藉的孔老二重新扶上“大成至圣先师”的宝座，妄图凭借这个亡灵来“治乱持危”、“维持国运”。他们的这种阴谋诡计，没有逃过鲁迅的锐利的目光，他早就下定决心，要“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两地书》）了！

在这篇杂文里，鲁迅非常明确地揭穿这股“尊孔读经”妖风是从哪里刮来的。他说：“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既然这些“孝”呀，“忠”呀，“贞节”呀等等孔孟之道，都是这帮皇帝、大臣、总统、督军“治天下”的理想的“软刀子”，他们当然都要“象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

但是，鲁迅说千万别以为提倡“尊孔读经”的反动人物是“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假如你真相信他们那一套，那就“谬以千里”了。那些高唱“读经救国”的“阔人”，其实都“是所谓别有用意”，即不管“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诬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这就把那些主张“读经”的“正人君子”的丑恶灵魂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遁形了。

鲁迅并没有就此收住他的锋利的投枪，他指出：“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原来这些载着孔孟之道的经书传授给这些孔孟之徒的，就是窃取美名经，撒诬造谣经，蝇营狗苟经，等等。正是这些“经”，把他们变成“聪明人”。鲁迅刺向孔孟之徒的这一投枪，也同时剖开了孔老二的胸膛，真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因此，他也是一个鲁迅笔下的“聪明人”。他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但却指使别人大量摘抄孔孟的“经书”，那不就是象鲁迅所指出那样，到这些经书里去取他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经！取他的搞阴谋、耍两面派的经！他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伎俩，不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么！

一切反动派都是卑污齷齪的骗子，林彪和五花八门的尊孔派，包括通令“尊崇孔圣”而阴谋复辟帝制的军阀头子，叫嚷“拚我残年极力卫道”为清王朝招魂的“本朝”遗老，叫嚣屠杀共产党人“就是行仁”的独夫民贼，胡说共产党员要学习“历代圣贤优美的遗教”的内奸工贼，完全一个样，都是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来宣扬孔孟之道的。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正是鲁迅一针见血指出的，在于捞取“目下的实利”。林彪的“实利”就是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但是，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圣徒”们都没有例外地落得个遗臭万年！

早在半个世纪前，鲁迅就坚决地对“尊孔读经”这股反动逆流“施行袭击”，而且是如此致命的一击，这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向纵深发展的批林批孔斗争，有极其深刻的启发。我们要学习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进一步揭发清算林彪及其死党利用孔孟之道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战斗。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①

一 解 题

《语丝》^②五七期上语堂^③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 play)^④，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⑤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 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

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吠^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⑦，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⑧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⑨；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⑩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⑪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象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 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⑫，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⑬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⑭。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⑮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⑯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

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①⑦}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女士^{①⑧}，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①⑨}，——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②⑩}。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②⑪}，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里的杨荫榆女士和陈西滢先生^{②⑫}，真是洪福齐天。

五 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是恕道^{②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是直道②④。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②⑤，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②⑥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②⑦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②⑧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②⑨，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⑩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

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⑳而已矣。

满心“婆理”^㉑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

“仁恕”呀，“勿以恶抗恶”^㉒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㉓，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㉔，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㉕和明的东林^㉖，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

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 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⑳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㉑。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㉒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㉓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㉔的高士^㉕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㉖，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㉗，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㉘殴曳^㉙女师大学生，《现代评论》^㉚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

“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毆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①。

八 结 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后编入《坟》。

②《语丝》，一九二四年创刊，一九三〇年停刊。它是注重思想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文艺刊物。鲁迅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一九

二八年上半年曾任该刊主编。

③语堂，即林语堂，买办资产阶级文人。他曾与投靠北洋军阀的现代评论派相勾结，后来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④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运动竞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胜利者对失败者要宽大，不要过分，不要穷追猛打。英国资产阶级曾鼓吹将这种精神运用于政治党派之间的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并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应有的“绅士作风”。其实，所谓“费厄泼赖”精神是极端虚伪的，它是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自己的剥削本质，麻痹革命人民，反对革命的反动说教。

⑤义角，即假角。买办资产阶级文人陈西滢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现代评论》上的《闲话》一文中攻击鲁迅说：“花是人人爱好的，魔鬼是人人厌恶的。然而因为要取好于众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颜色，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意思是说：鲁迅的文章为读者所欢迎，是因为鲁迅为了讨好读者而假装成一个战斗者的缘故。鲁迅在这里顺便给以回击。

⑥嗥(háo)，野兽吼叫。

⑦受洗，接受洗礼。洗礼是基督教入教仪式。由牧师将水洒在受洗人头上，或洗其身，以示洗涤罪孽。

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即英国百科全书。

⑨可掬(jū)，可以用双手捧取。

⑩孔丘提出的中庸之道，是他鼓吹“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的理论武器。所谓“中庸”，就是要求人们不偏不倚地、百分之百地严格遵守“周礼”，不允许有丝毫的偏离。这实质上是为了维护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度，把这种等级制度绝对化、永恒化，是地地道道的反对社会变革的保守、倒退、复古的反动哲学。历代反动统治者利用中庸之道，鼓吹调和折衷、倒退保守的思想，借以掩盖社会矛盾，反对阶级斗争，巩固旧的社会秩序，维护其反动统治。

⑪餮(huàn)，喂养牲畜。

⑫康党，指参加十九世纪末康有为等要求清政府“变法维新”运动的人。康有为，参看《我之节烈观》注⑤。

革党，指孙中山领导的反清的革命党。

⑬顶子，清代官员帽顶上的帽珠，以颜色分别官阶等级。最高的一品官员的顶子是用红珊瑚制成的。这里是讽刺官僚、绅士用告密和捕杀革命党人作为升官的手段。

⑭清朝统治者限令男人一律要蓄发留长辫，违者处死。自反清的革命运动高涨之后，一些人怕被革命党剪掉辫子，以致被清政府杀头，于是把辫子盘在头顶上，这样既不会有杀头的危险，同时也表示他已经“革命”了。

⑮“咸与维新”，见《书经·胤征》：“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咸，一切；与，给予，即一切都要革新。

⑯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阴谋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孙中山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发动了讨袁战争，八月底失败。史称“二次革命”。

⑰鬼蜮(yù)，蜮，传说中一种害人的动物，比喻阴险的坏人。

⑱秋瑾(1875—1907)，自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党人。与徐锡麟等进行反清革命活动，一九〇七年七月被清政府逮捕，被杀于绍兴城内古轩亭口。

⑲都督，民国初年掌握一个地区军政大权的官员。

⑳王金发，浙江嵊县人，光复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后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杀害。

㉑谋主，即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指在幕后出谋划策杀害秋瑾的绍兴大地主章介眉。

㉒杨荫榆，曾留学美国，一九二四年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她为北京女师大校长，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反对革命，压迫学生。陈西滢，即陈源，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原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后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杨荫榆和陈西滢都是江苏无锡人。陈西滢在一九二五年八月《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闲话》中曾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这里所说的“模范的名城”，即指此。

⑳“犯而不校”，语见《论语·泰伯》。校（jiào 较），计较。恕，宽恕。意思是：别人触犯自己而不要计较，就是恕道。

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语见基督教《旧约》。意即别人用什么方法对付我，我也用什么方法对付他，针锋相对，所以说是直道。

㉒枉道，对直道而言。枉，弯曲。

㉓噬啗（shì niè 士捏），都是咬的意思。

㉔哀矜（jīn 今），即哀怜。

㉕恻隐，对受难的人表示同情。

㉖投石下井，比喻别人在危难中，不加援助，反而陷害。

㉗“请君入瓮”，瓮，大坛子。唐朝的酷吏周兴，为了逼使犯人招供，用炭火把瓮烧热，把犯人放进瓮中的一种残酷的刑法。后来有人控告周兴谋反，另一酷吏来俊臣也威胁要用此法来对付他。“请君入瓮”后来引申为自作自受的意思。

㉘“党同伐异”，指观点、立场相同的人结成一党，攻击观点、立场不同的人。这句话原有贬斥的意思。但在阶级社会中，党同伐异是必然现象。陈西滢曾以此攻击鲁迅，鲁迅在此用这句话来反击他。

㉙“婆理”对“公理”而言。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师大学生反对反动校长杨荫榆，买办文人陈西滢等组织“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支持杨荫榆镇压进步学生。而杨荫榆把她和女学生的冲突说成是“与此曹子勃谿相向”，即婆媳吵架，俨然以封建家庭的婆婆自居。因此，鲁迅说她的理是“婆理”。

㉚“勿以恶抗恶”，基督教的一种反动说教，意为不要以暴力对抗暴力。

㉛营就三窟，古谚有“狡兔三窟”，即狡猾的兔子有三个洞穴，为遇险时准备逃路。

㉜赫奕（yì 亦），显耀盛大的样子。

㉝汉的清流，指东汉末年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在朝作官的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揭露宦官的专横，因而遭到诬陷、迫害，先后被杀死、充军和囚禁的达七、八百人，历史上称为“党

辔之祸”。

⑳明的东林，指明朝末年的东林党。当时顾宪成、高攀龙等聚集在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并和在朝的部分官吏联合，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后来遭到宦官魏忠贤的迫害，被杀的有数百人。

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宋代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中所说的话。意思是：拿他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他自己。

㉒臻（zhēn针）于郅（zhì至）治，臻，达到。郅，极。这句话的意思是：达到把国家治理得极好的地步。

㉓笞（chī吃）刑，旧时用鞭、杖或竹板打犯人的一种刑法。

㉔燧（suì遂）人氏，古代传说中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的人。

㉕尧舜，即唐尧、虞舜，儒家崇拜的两个传说中的古代帝王。

㉖高士，志行高尚的人，多指隐士。这里指那些口头讲“仁义道德”的人，是反语。

㉗“求仁得仁又何怨”，语见《论语·述而》，是孔丘的话。意思是：凡想求得仁便得到仁的人，又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㉘以己律人，拿自己的主张去约束别人。

㉙刘百昭，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在女师大事件中，他曾率领军警和女流氓殴打学生，并将学生强拖出校。

㉚曳（yè业），拉，拖。

㉛《现代评论》，周刊，买办资产阶级文人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的反动刊物。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停刊。

㉜镖（biāo标），同鏢，一种投掷武器。保镖，旧时富豪或官僚雇佣会武术的人来保护自身和财物的安全。泽，雨露，引申为“德泽”、“恩泽”。遗泽，即遗留下来的“德泽”。这里指章士钊为解散女师大而成立的女子大学。

刺向“中庸之道”的锋利匕首

——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口头背诵马列词句，实际奉行孔孟之道，什么“凡事勿做绝了”呀，什么“中庸之道……合理”呀，都是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的黑货，是早已被鲁迅批驳得臭不堪闻的破烂。重读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杂文，对于揭露和批判林彪贩卖“中庸之道”、攻击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反革命罪行，是很有帮助的。

一九二五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撼世界的“五卅”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声势浩大的北伐进军即将开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残暴统治，面临着覆灭的命运。依附于反动阶级的“绅士们”，也惶惶然感到快要成为“丧家之狗”了。就在这个时候，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周作人、林语堂相继跳了出来，装出一副“公正”的伪善面目，为反动统治者开脱。先是周作人（岂明）发表《失题》一文，认为段祺瑞既已失势，“就

没有加以批评之必要”了，主张不要再“打落水狗”。林语堂立即加以响应，发表了《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要求“对失败者不应再施行攻击”，不要“投石下井”。他们一唱一和，妄图以此瓦解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挽救反动统治者的灭亡。鲁迅以其长期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立即看穿周、林之流提倡所谓“费厄泼赖”精神的反动实质和罪恶目的，写了这篇杂文严加驳斥，主张“痛打落水狗”，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对敌人绝对不能宽容，而要“作彻底的战斗”。

西方资产阶级提倡“费厄泼赖”，要求对失败者要宽大，不要过分，不要穷追猛打，其实和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一样，全是骗人的鬼话。西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这种“费厄泼赖”精神，也就是东方孔老二所提倡的“中庸之道”。所以，鲁迅在这篇杂文中，在无情地揭露西方资产阶级所谓“费厄泼赖”的极端虚伪性同时，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极端反动的孔孟之道。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影响极为深广。所谓“中庸”、“恕道”，就是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历代反动统治者无不利用它来愚弄和麻痹人民，要人民受他们的剥削、奴役和压迫，而不要起来造反。特别是在反动统治阶级处于不利情况的时候，他们更是以此作为救命法宝，竭力加以鼓吹。“犯而不校”啦，“仁恕”啦，“不报复”啦，“勿以恶抗恶”啦，如此等等，一句话：不要造反动派的反。对于这种瓦解人民群众的斗志，为反动阶级迫害人民群众打掩护的说教，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

方的，不管叫做“费厄泼赖”还是叫做“中庸之道”，鲁迅都毫不留情地加以痛斥，深刻地揭露它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并谆谆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在阶级社会中，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哪里有什么“中庸”、“恕道”，哪里有什么“费厄泼赖”！这篇杂文可以说是鲁迅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他曾说：“论‘费厄泼赖’这一篇，……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鲁迅在这里为我们总结的血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揭示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是必须永远记取的。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九七〇年，却躲在阴暗角落里叫喊什么“中庸之道……合理”，实质上就是要用这个反革命复辟之“理”来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鲁迅在文中为这类“中国特产”的叭儿狗画相：“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这同林彪的狗相神似极了。其实林彪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何曾有什么“中庸”？只要看看他那个杀机毕露，要叫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完全可以看到他们是“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的。当前，批林批孔的斗争正向纵深发展，我们一定要学习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有趣的消息^①

虽说北京象一片大沙漠，青年们却还向这里跑；老年们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别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转回来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灰世诗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系之矣”，然而他总活着；连祖述释迦牟尼^②先生的哲人勛本华尔^③也不免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不肯轻易“涅槃”^④。俗语说：“好死不如恶活”，这当然不过是俗人的俗见罢了，可是文人学者之流也何尝不这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总有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还有一条尤其义正辞严的逃路。真的，倘不这样，人生可真要无聊透顶，无话可说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贵起来；自己的“区区金事”，又因为“妄有主张”，被章士钊先生革掉了^⑤。向来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来夫^⑥的话来说，是“没有花，没有诗”，就只有百物昂贵。然而也还是“妄有主张”，没法回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⑦的家事似

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⑧。然而，惜哉，没有这样的好妹子；“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殒乎羽之野。”^⑨连有一个那样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灵均。我的终于“妄有主张”，或者也许是无可推托之故罢。然而这关系非同小可，将来怕要遭殃了，因为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报应的。

话要回到释迦先生的教训去了，据说：活在人间，还不如下地狱的稳妥。做人有“作”就是动作（=造孽），下地狱却只有“报”（=报应）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狱的原因，而下地狱倒是出地狱的起点。这样说来，实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这自然也只限于“有根”（据说，这是“一句天津话”^⑩）的大人物，我却不大相信这一类鬼画符。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里，枯燥当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态，除了百物昂贵之外，究竟还是五花八门，创造艺术的也有，制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缘故，也就是人们总还要奔凑聚集的缘故。可惜的是只有一些小玩意，老

实一点的朋友就难于给自己竖起一杆辞严义正的军旗来。

我一向以为下地狱的事，待死后再对付，只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于是便不免于有时得罪人，有时则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但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当然要受报，那也只好准备着，因为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的是更不能竖起辞严义正的军旗来的。其实，这里也何尝没有国家大事的消息呢，

“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呀，“国军一致拥段”哪，有些报纸上都用了头号字煌煌地排印着，可以刺得人们头昏，但于我却都没有什么鸟趣味。人的眼界之狭是不大有药可救的，我近来觉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见那在德国手格盗匪若干人，在北京率领三河县老妈子一大队的武士刘百昭校长居然做骈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学，教部备员，多艺之誉愧不如人，审美之情差堪自信”^⑩，还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实在没有料想到。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闲事的“学者”，今年不管闲事了，在年底结清帐目的办法，原来不止是掌柜之于流水簿，也可以适用于“正人君子”的行为的。或者，“阿哥！”这一声叫，正在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间十二点钟罢。

但是，这些趣味，刹那间也即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变动，也诚然是可恨。我想，照着境遇，思想言行当然要迁移，一迁移，当然会有所以迁移的道理。况且世界上的国庆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们的军旗，是全都早经竖定了的。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⑫，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逢，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⑬，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⑭，勃朗宁夫妇岂不是讲恋爱的模范么^⑮，勛本华尔和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⑯，……归根结蒂，如果杨荫榆或章士钊可以比附到犹太人特莱孚斯去，则他的箴片就可以等于左拉等辈了。这个时候，可怜的左拉要被中国人背出来；幸而杨荫榆或章士钊是否等于特莱孚斯，也还是一个大疑问^⑰。

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的坏人（如水平线下的文人和学棍学匪之类）^⑱，似乎将来要大吃其苦了，虽然也许要在身后，象下地狱一般。但是，深谋远虑的人，总还以从此小心，不要多说为稳妥。你以为“闲话先生”真是不管闲事了么？并不然的。据说他是要“到那天这班出锋头的人们脱尽了锐气的日子，我们这位闲话先生正在从容的从事他那‘完工的

拂拭，(The finishing touch)，笑吟吟的擎着他那枝从铁杠磨成的绣针，讽刺我们情急是多么不经济的一个态度，反面说只有无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凭证”。^{①⑨}（《晨报副刊》一四二三）

后出者胜于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堕落的民族。即以衣服而论，也是由裸体而用会阴带或围裙，于是有衣裳，袂冕。我们将来的天才却特异的，别人系了围裙狂跳时，他却躲在绣房里刺绣，——不，磨绣针。待到别人的围裙全数破旧，他却穿了绣花衫子站出来了。大家只好说道“阿！”可怜的性质野蛮人，竟连围裙也不知道换一条，怪不得锐气终于脱尽；脱尽犹可，还要看那“笑吟吟”的“讽刺”的“天才”脸哩，这实在是对于灵魂的鞭责，虽说还在辽远的将来。

还有更可怕的，是我们风闻二〇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发表一部著作^{②⑩}。内容如何，只有百年后的我们的曾孙或玄孙们知道罢了，但幸而在《现代评论增刊》上提前发表了几节，所以我们竟还能“管中窥豹”^{②⑪}似的，略见这一部新书的大概。那是讲“现代教育界的特色”的，连教员的“兼课”之多也说在内。他问：“我的议论太悲观，太刻薄，太荒诞吗？我深愿受这个批评，假使事实可以证明。”这些批评

我们且俟之百年之后，虽然那时也许无从知道事实，典籍呢，大概也只有“笑吟吟的”佳作留传。要是当真这样，那大半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后人总不至于以为刻薄罢。但我们也难于悬揣，不过就今论今，似乎颇有些“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②②}之意了。人们不逢如此盛事者，盖已将二千四百年云。

总之：百年以内，将有陈源教授的许多(?)书，百年以后，将有陶孟和教授的一部书出现。内容虽然不知道怎样，但据目下所走漏的风声看起来，大概总是讽刺“那班出锋头的人们”，或“驰驱九城”^{②③}的教授的。

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②④}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锋头；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

这些信仰，也许是迷信罢，但神道设教，于“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还是不无裨益。况且，未能将坏人“投畀豺虎”^{②⑤}于生前，当然也只好口诛笔伐之于身后，孔子一车两马，倦游各国以还，抽出

钢笔来作《春秋》，盖亦此志也。

但是，时代迁流了，到现在，我以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连闹这些玩意儿的人们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况所谓坏人们。得罪人要受报应，平平常常，并不见得怎样奇特，有时说些宛转的话，是姑且客气客气的，何尝想借此免于下地狱。这是无法可想的，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

一月十四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国民新报副刊》，后编入《华盖集续编》。

②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5—486年），佛教创始者，姓乔答摩，名悉多，印度释迦族人。牟尼即圣人之意。

③勛本华尔，通译叔本华（1788—1860），德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厌世主义者。他的思想曾部分地受了印度佛教哲学的影响，所以这里说他“祖述释迦牟尼”。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曾发现医治梅毒的药方，这里说他“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即指此事。

④涅槃，梵语，原意为寂灭、解脱。后来佛教徒死亡，称为圆寂，亦称涅槃。

⑤鲁迅从一九一二年起在教育部任佥事，一九二五年因他支持女师大学生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的正义斗争，被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革职，鲁迅因此曾在平政院提出控告。当时有人在报上诬蔑说他因为失了“区区佥事”就反对章士钊，没有“学者的态度”。参看《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⑥安特来夫（1871—1919），通译安德烈夫，俄国小说家和戏剧家，以描写阴冷，恐怖著称。

⑦“闲话先生”，指北洋军阀的走狗、反动文人陈源即陈西滢，他经常在他们一伙主办的《现代评论》杂志上以《闲话》为题，发表反动文章。下面所说的“家事”，是从陈源的同伙徐志摩《“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中引来的。

⑧《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统称。陈源在一篇文章中说：“就以《四书》来说”，“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其实《四书》这个名称，是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把上述四书合称为《四子书》之后才有的，根本不会有汉朝人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鲁迅在这里顺笔加以讽刺，戳穿陈源之流所谓“学者”的假面。

⑨语见屈原（屈灵均）《离骚》。女嬃，一般以为是屈原自称其姊，《说文》：“楚人谓姊为嬃”。鲧（gǔn滚），夏禹的父亲，相传他因治水无功，被舜杀于羽山。

⑩这句话见徐志摩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参看《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7）》。

⑪刘百昭，参看《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注⑥。在女师大驱杨运动中，刘百昭奉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命令武装接收女师大，曾恐吓学生说：“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并雇用女流氓百余人随同巡警将女师大学生殴曳出校。这里所引的骈文，是刘百昭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时，为《艺专旬刊》所作的《发刊词》中自我吹嘘

的句子。

⑫照一般的说法，在我国古代思想学说里，儒家（孔丘）、墨家（墨翟）都是主张“有所为”的，道家（老聃）是主张“无为”而治的。

⑬关龙逢（páng庞），夏桀王的臣子，因谏桀作酒池，被杀。少正卯（？——公元前498年），春秋时鲁国大夫，公开宣传革新主张，是法家的先驱者。孔丘在鲁国当司寇摄行宰相职务时，为了维护奴隶制，借少正卯鼓吹“邪说”等罪名，将他杀害。以后历代反动统治者常举“诛少正卯”为例，以迫害主张改革的人。

⑭达尔文（1809—1882）和赫胥黎（1825—1895）都是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者，他们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剧烈的生存斗争。克鲁巴金，通译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互助是人类的“本性”，著有《互助是进化的因素》等书。

⑮勃朗宁（1812—1889）和勃朗宁夫人（1806—1861）都是英国诗人，他们曾不顾勃朗宁夫人的父亲的反对，秘密结婚。

⑯叔本华和尼采（1844—1900）都是德国的反动哲学家。他们都是反对妇女解放的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妇女极尽污蔑咒骂之能事。

⑰特莱孚斯，通译德雷福斯，法国犹太籍军官，一八九四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他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判处终身苦役。法国作家左拉（1840—1902）仗义执言，曾写文章为他辩护。陈源在其《闲话》中，把杨荫榆、章士钊比作特莱孚斯，而以左拉自譬。篋片是豪门帮闲的俗称，这里指陈源等。

⑱“水平线下”和“学棍学匪”是陈源之流污蔑谩骂反对他们的人的话。

⑲这一段也是引自徐志摩《“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是替陈源吹嘘的。

⑳陶孟和，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现代评论》的撰稿人。他曾在该刊发表《现代教育界的特色》一文，题下自注：“这是要到二〇二五年才可以发表的一部著作里的几节。”

㉑管中窥豹，成语：“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语出《世说新

语》。意思是从管子里看豹，只能看见豹身上的一块斑纹，比喻所见有限。

⑳《春秋》，相传是孔丘根据鲁国史官记事而作的一部鲁国的史书。旧说孔丘写此书的目的，是正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也就是为了恢复和巩固日趋崩溃的奴隶制社会秩序。后来孟轲吹捧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见《孟子·滕文公》）所谓“乱臣贼子”，是指春秋时摒弃周礼，破坏奴隶制度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鲁迅引用这一句话，是指陈源之流写文章就象孔丘作《春秋》一样，攻击进步势力，维护反动统治。

㉑驰驱九城，即奔走于北京全城的意思，因北京有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等九门，故以“九城”代称北京全城。当时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教师待遇菲薄，许多教授同时兼任几间学校的课，终日奔波，才得温饱。陶孟和在文章里讽刺这些兼课者“以授课为营业”，“在一星期里驰驱——如在北京——于九城之中”。

㉒小乘教，印度佛教派别之一，别于大乘教而言。它的教义，主要是宣传地狱轮回，因果报应。

㉓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女师大学生驱杨斗争胜利，女师大复校。陈源等支持章士钊创办女子大学，妄图破坏女师大复校，纠集同伙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后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发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攻击女师大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狂妄叫嚣：“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投畀豺虎”，语出《诗经·小雅·巷伯》，畀(bì)闭，给予，即投去喂豺狼虎豹。

警惕骗子的骗人伎俩

——读《有趣的消息》

骗子骗人，伎俩可谓多矣，但不管怎样千变万化，总有规律可寻。早在二十年代，鲁迅在和反动文人陈源之流作斗争时所写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便对骗子们的这种伎俩，作过精辟的概括和深入的揭露。重温这篇杂文，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很有启发。

鲁迅指出，大凡骗子，总要把自己装扮成“正人君子”，总要为自己竖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而这“军旗”，就是他的幌子。明明干的不是人的勾当，可又偏要在自己头上画一道“光圈”，打一通“公理正义”的名号，把真实的面目隐蔽得严严实实。当陈源之流充当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叭儿狗，残酷镇压女师大学潮的时候，满口“公理”，何等嚣张。但当他们遭到失败，西洋镜有被拆穿的危险时，马上又转而装出一副大受委屈的脸孔，宣称“不管闲事了”，并把自己比附于为被诬告的法国军官特莱孚斯而仗义执言的左拉，似乎“正义”仍然在他们一边，借以掩护退却，以便伺机反扑。这时，他们的旗帜又不同了。鲁迅无情地戳穿了骗子们的这种伎俩，指出，“他们的军旗，是全都早经坚定

了的”：要做事的时候，他们就“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就“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就把自己打扮成忠心耿耿的关龙逢，要杀人的时候，则把被杀者说成是罪该万死的少正卯。总之，万变不离其宗：骗人。

一切反动派都是善于随机应变的。随着境遇的不同，他们所竖的旗帜也不同，有时是一张吓人的“虎皮”，有时是一条绣花的“裙子”。然而“虎皮”也好，“裙子”也好，其为骗局则是一样的。在这篇杂文里，鲁迅进一步指出，视不同的气候，竖不同的旗号，这玩艺并不是陈源之流的新发明，而是从孔老二那里拣来的老破烂。两千多年前，鼓吹“为政以德”、“焉用杀”的孔老二，一旦得势上台，马上又借口“治国纲纪”，向革新派人士少正卯开刀。陈源之流所投靠的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在“女师大事件”后，不是连忙在当时鼓吹读经复古的反动杂志《甲寅》（第一卷第十八号）上抛出《二感篇·内感集》，极力赞美“少正卯之诛”，是“圣人”“不得已而出此”，是“以安良善”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么？这显然是为他们以后准备制造“三·一八”惨案、通缉包括鲁迅在内的进步人士而放出的反革命舆论。而一旦事情败露，形势不利，他们马上又转而换了另一副面孔，唱出了另一个腔调，打出了另一面旗帜，企图在那里继续骗人，以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叛徒林彪一伙所使用的鬼蜮伎俩，更可谓集古今中外反动派之大成。他们表面上口口声声“高举”“紧跟”，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旗帜打得冠冕堂皇；可实际上呢，却念念不

忘“克己复礼”，暗中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但是，谎言是骗不了人的。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无论是袁世凯、蒋介石还是林彪，不都一一遭到失败，被中国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吗？

目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斗争十分激烈，不甘心灭亡的反动阶级必将使用各种各样的伎俩来同无产阶级较量，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革命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持斗争，才能不断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一点比喻^①

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②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③，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

“往那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袁世凯^④明白一

点这种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为他是不很读书的，所以也就难于熟悉运用那些的奥妙。后来的武人⑤可更蠢了，只会自己乱打乱割，乱得哀号之声，洋洋盈耳，结果是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然而“经一事，长一智”，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只要没有人问——

“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

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野猪脱出了牧豕奴⑥所造的猪圈，走入山

野，不久就会长出来。

Schopenhauer ⑦ 先生曾将绅士们比作豪猪，我想，这实在有些失体统。但在他，自然是并没有什么别的恶意的，不过拉扯来作一个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⑧ 里有着这样意思的话：有一群豪猪，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体温来御寒冷，紧靠起来了，但它们彼此即刻又觉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离开。然而温暖的必要，再使它们靠近时，却又吃了照样的苦。但它们在这两种困难中，终于发见了彼此之间的适宜的间隔，以这距离，它们能够过得最平安。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他们最后所发见的距离，——使他们得以聚在一处的中庸的距离，就是“礼让”和“上流的风习”。有不守这距离的，在英国就这样叫，“Keep your distance!” ⑨

但即使这样叫，恐怕也只能在豪猪和豪猪之间才有效力罢，因为它们彼此的守着距离，原因是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假使豪猪们中夹着一个别的，并没有刺，则无论怎么叫，它们总还是挤过来。孔子说：礼不下庶人⑩。照现在的情形看，该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

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定适当的距离。孔子又说：刑不上大夫。这就又难怪人们的要做绅士。

这些豪猪们，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来抵御的，但至少必须拚^①出背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无礼”。

一月二十五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四期。后编入《华盖集续编》。

② 阖城，阖（hé河），即合，全城的意思。

③ 铃铎，铎（duó夺），原为大铃，这里指一般的铃铛。

④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头目。辛亥革命后，他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行复辟称帝的阴谋活动，通令“尊崇孔圣”，举行“祝孔典礼”，为复辟帝制制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正式称帝，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不久即被迫下台。

⑤ 后来的武人，指袁世凯之后的张勋、段祺瑞、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等反动封建军阀。他们一方面鼓吹尊孔读经，一方面却干着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

⑥ 牧豕奴，即“猪倌”。牧，放养牲口；豕（shǐ史），即猪。

⑦ Schopenhauer，即叔本华，参看《有趣的消息》注③。

⑧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德文：“副业和补遗”。一八五一年出版的叔本华的一本杂文集。

⑨ Keep your distance, 英语：“保持你的距离！”

⑩ “礼不下庶人”和后面的“刑不上大夫”都是《礼记·曲礼》中所引孔丘的话。庶人，老百姓。礼不下庶人，是说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的礼制不适用于老百姓。大夫，古代官名，位居诸侯之下。刑不上大夫，是说统治阶级制定的刑法不适用于统治阶级。这两句话反映了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的法律保护反动阶级、压迫人民的反动本质。

⑪ 拚 (pàn判)，舍弃。

“豪猪的刺”和“野猪的牙”

——读《一点比喻》

“礼”是林彪和孔老二坚持倒退，反对前进，坚持复辟，反对革命的精神支柱。孔老二终身为鼓吹“克己复礼”奔走，林彪也把“克己复礼”当作万事中最大的事，三番四复地写成条幅，作为座右铭。批孔反儒的伟大战士鲁迅，在他的许多杂文里，对这个“礼”的反动实质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一点比喻》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

在这篇杂文里，鲁迅针对一九二五年复古主义者掀起的尊孔读经逆流，借用一个外国人对“绅士们”的“一点比喻”，把当时为北洋军阀所豢养的买办文人胡适、陈源之流的“绅士”比作“豪猪”；把他们鼓吹的“礼让”和“上流的风习”，比作一群豪猪取暖时为了避免彼此刺痛而不得不保持的“适宜的间隔”。

鲁迅特别指出，这种“中庸的距离”亦即“礼让”，只在豪猪之间也就是“上流社会”之间才有效。因为没有刺，夹在中间，则无论怎样叫，豪猪们总还是挤过来。这就是孔老二说的“礼不下庶人”——“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庶人”受伤，也只能怪自己没有“刺”，假如

有“刺”，这些“上流社会”的绅士也就不得不“守定适当的距离”了。鲁迅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深刻地揭露了“礼”和“礼让”的反动实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把“礼治”说成是“治国”、“兴邦”的根本，就是因为“礼”是他们维持反动统治的工具和精神支柱。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者，只不过是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巩固和加强他们对被他们剥削压迫的“庶人”的统治，而对于“庶人”，只要还有一点血汗可以榨取时，豪猪们总还是要拚命挤过来的。总之，有“刺”就有“礼”，没有“刺”就成为“礼”的牺牲品，这就是“礼”的实质，“礼治”的真相。

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深懂“礼”的这种“妙用”，极力维护他们的“礼治”。所以，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对于坚决反对“礼治”的法家，总是横加指责和攻击，甚至加以杀害。孔老二就是一面杀害少正卯，一面狂叫“克己复礼”，妄图以此来挽救奴隶主阶级灭亡的命运。两千多年后，买办文人胡适、陈源之流也很懂得这一套。他们一面高喊“礼让”，一面为其主子北洋军阀迫害和镇压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拍手叫好。独夫民贼蒋介石更是满口“礼义廉耻”，满手革命人民的鲜血。

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门徒，对孔老二的这一套，更是心领神会，视若珍宝，念念不忘“克己复礼”。他要恢复的是“豪猪社会”的“礼”，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他那杀气腾腾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是他“复礼”的反动纲

领。但是，林彪也同孔老二的下场一样，“复礼”未成，就去见他们所梦想的周公了。

在这篇杂文里，更发人深思的是鲁迅除了“豪猪的刺”的比喻之外，又作了另一个“野猪的牙”的比喻。鲁迅用这个“比喻”，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要使“人们，尤其是青年，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的论调。在这里，鲁迅实际上是对那些被驱上“正路”的人们发出大声的喝问：“往那里去？！”并告诉他们说：没有长牙的猪，是只能任人摆布；“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但野猪的牙是怎么来的？鲁迅说，“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

请看，鲁迅早在半个世纪前，就用这“一点比喻”号召革命人民从精神上摆脱“牧豕奴所造的猪圈”，即砸烂孔孟之徒所造的“礼让”之类的精神枷锁，用“野猪的牙”来对付“豪猪的刺”，才能“无礼”地捣毁那个罪恶的“豪猪社会”！

读完《一点比喻》，确是教人大长了批林批孔的战斗决心！

老调子已经唱完^①

——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初看似乎有些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

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在这时候，他们的本国是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听到。我想，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再说欧美的几个国度罢。他们的文艺是早有些老旧了，待到世界大战时候，才发生了一种战争文学。战争一完结，环境也改变了，老调子无从再唱，所以现在文学上也有些寂寞。将来的情形如何，我们实在不能预测。但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的。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

“特别国情”。——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

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

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②，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③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

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

这个时候，起来的是明太祖^④。元朝的老调子，到此应该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⑤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满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

别的本领。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重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从前西洋有一个国度，国名忘记了，要在非洲造一条铁路。顽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对，他们便利用了他们的神话来哄骗他们道：“你们古代有一个神仙，曾从地面造一道桥到天上。现在我们所造的铁路，简直就和你们的古圣人的用意一样。”非洲人不胜佩服，高兴，铁路就造起来。——中国人是向来排斥外人的，然而现在却渐渐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调子了，还说道：“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⑥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国人也说道：“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

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

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象元朝清朝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

那么，怎么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

但是，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这“软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发明的，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做贾鳧西的^⑦，鼓词里曾经说起纣王，道：“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⑧悬才知道命有差。”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

一把软刀子。

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听说是因为我们野蛮；现在，倒不大遇见有枪炮来打我们了，大约是因为我们文明了罢。现在也的确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于是就改用软刀子。我想：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饌^⑨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

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

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我曾经做过一篇杂感，大意是说：“凡称赞中国旧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稳地方的富人，因为他们有钱，没有受到国内战争的痛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赏来。殊不知将来他们的子孙，营业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贱，去开的矿洞，也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深。”这就是说，将来还是要穷的，不过迟一点。但是先穷的苦人，开了较浅的矿，他们的后人，却须开更深的矿了。我的话并没有人注意。他们还是唱着老调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国去。但从此以后，不能象元朝清朝一样，唱完别人了，他们是要唱完了自己。

这怎么办呢？我想，第一，是先请他们从洋楼，

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点。“跨出房门，是危险的。”自然，唱老调子的先生们又要说。然而，做人是总有些危险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长寿，白胡子的老先生应该非常多；但是我们所见的有多少呢？他们也还是常常早死，虽然不危险，他们也糊涂死了。

要不危险，我倒曾经发见了一个很合适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牢狱。人坐在监牢里，便不至于再捣乱，犯罪了；救火机关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盗劫，到牢狱里去抢东西的强盗是从来没有的。坐监是实在最安稳。

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现在我还要谢诸位今天到来的盛意。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后编入《集外集拾遗》。

②理学，亦称道学。是宋以来的反动学者程颢、程颐、朱熹等从义理方面解释孔孟之道的所谓“天命”、“人性”的唯心主义哲学。

③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北宋时代著名的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文学家。他尊法反儒，主张改革政治，推行新法，同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展开了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斗争，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结果由于变法派内部的不坚决和大地主集团的多方阻挠而遭到失败。

④明太祖（1328—1398），即朱元璋，明朝的开国君主。

⑤八股，即八股文，明清考试制度（即所谓“科举”）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的文体。题目限于《四书》，内容必须根据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部分组成，后四部分都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一共有八股，故称八股文。这种形式死板、内容空虚的文体，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这种文体，到清末光绪年间才被废除。

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语见《论语·公冶长》。桴（fú扶）’小木筏。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政治主张如果不能实现，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

⑦贾凫西，山东曲阜人，明末清初鼓词作家，著有《木皮散人鼓词》，叙述历代兴亡治乱，揭露了一些统治阶级的昏聩腐败。

⑧太白，亦作大白，即白色的旗。纣王是殷商的末代君主。周武王联合西南各族攻打纣王，斩了纣王的头挂在太白旗上。

⑨肴饌（yáo zhuàn 肴撰），鱼肉为肴，饮食为饌。即用鱼肉等做的菜。

警惕“软刀子”

——读《老调子已经唱完》

一九二七年二月，鲁迅到广州不久，应香港一个青年团体的邀请，到那里去作了题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著名的讲演。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鲁迅有力地抨击了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南北呼应，华洋合流，利用封建文化，鼓吹复古倒退，毒害人民群众的罪恶阴谋，深刻地揭示了剥削阶级总是死抱住“老调子”不放，总是妄图守住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世袭领地，借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阶级本质。

鲁迅把中国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等等，用了一个极其形象的说法来加以概括：老调子。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前进的，“老调子”本来应该有唱完的时候；但中国“很奇怪”，不仅“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而且“还没有唱完”。他针对当时国内复古派叫嚷“保古”，买办文人胡适一伙鼓吹“整理国故”，和香港殖民统治者提倡尊孔读经，唱同一个“老调子”的现象，联系到宋、元、明、清的种种史实，以古喻今，对上层建筑领域复杂的阶级斗争事实，作了十分精辟的

剖析，一针见血地指出：老调子“就是一把软刀子”，它的可怕就在于“割头不觉死”。

鲁迅对“老调子”深恶痛绝。他目击封建军阀“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马上支日记》）的血淋淋的现实，清醒地认识到：拜倒在古人脚下，“老调子”一个接一个唱下去，中国的“苦人会多起来”。鲁迅号召在大革命时代中的青年，坚决抛弃“老调子”，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走出来，接触社会，深入实际，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虽然这样做比躲在房子里“要历些危险”，但为了中国的自由解放，就必须走这一条“明明白白”摆着的路。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他们对于被压迫的人民，在使用钢刀的同时，还要用“软刀子”。老调子这把软刀子，正是反动统治者用来发挥牧师职能的精神武器。剥削阶级把老调子奉为至宝、代代相传的奥妙也就在这里。鲁迅一方面指出历史上凡是唱老调子的保守势力，最后都逃不了灭亡的命运，同时又断言：老调子还没有唱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鲁迅论断的正确。且看这篇杂文发表四十多年后的事实：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不正是二千多年以来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唱烂了的、老得不能再老的“老调子”吗？什么“克己复礼”，什么“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什么“天才”，“超天

才”，不就是同一家老店的黑货吗？高唱老调子，是为了搞新阴谋。鲁迅无情地揭露了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赞扬“中国文化”，鼓吹尊孔读经，全属别有用心，全是想用软刀子杀人，“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林彪一伙捡起孔孟之道这面破旗，是以此作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他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林家世袭王朝的反动思想武器，要千百万人头落地，要中国人当亡国奴。鲁迅当年对中外反动派的揭露，不同样适用于今天吗？

重温鲁迅这篇杂文，以提高我们对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的认识，更好地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坚决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鲁迅在文中指出的“老调子还没有唱完”的事实，是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老调子”，虽然又受到了一次有力的冲刷，但还远不是从此就可以太平无事了。“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守旧与革新、倒退与前进、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今后还必将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必须认真学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战斗武器，认真学习鲁迅宝贵的战斗经验，时刻警惕剥削阶级的复辟阴谋，及时识破并战胜那些使用“软刀子”向我们进攻的敌人，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①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②和董卓^③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④之后，这时曹操^⑤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

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⑥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⑦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⑧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⑨。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

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⑩！”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⑪，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人⑫，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⑬。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⑭”，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⑮，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⑯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⑰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⑱，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⑲，还有明帝曹

睿^⑳，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㉑。《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㉒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㉓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㉔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㉕；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㉖，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

后来称为“建安七子”^⑲。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⑳，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㉑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㉒。

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③。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借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④，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⑤。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⑥。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

司马氏^⑤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⑥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

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扞虱而谈”^{③7}，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扞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③8}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

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 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³⁹。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⁴⁰和夏侯玄⁴¹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⁴²。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⁴³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

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④④}，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④⑤}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④⑥}。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④⑦}和阮籍^{④⑧}。但是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

酒，刘伶^④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⑤。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⑥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⑦。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⑧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

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⑤④}里有说：

“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⑤⑤}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⑤⑥}，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⑤⑦}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⑤⑧}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⑤⑨}，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⑥⑩}，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也就反

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⑥1}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⑥2}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⑥3}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坏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⑥4}的《崇有论》，孙盛^{⑥5}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

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⑥⑥}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⑥⑦}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褻黜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⑥⑧}河南之类

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⑨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⑩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

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①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⑫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⑬。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⑦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⑧兼爱，

杨子^⑥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⑦。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后由作者编入《而已集》。副标题“九月间”有误，据《鲁迅日记》，应为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

文章中提到的魏晋，是我国的两个历史朝代（魏220—265，晋265—420）；风度，即风格和态度。这里说的“魏晋风度及文章”是指魏晋时期以曹操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人为代表的风度和诗文。

②黄巾，即公元一八四年以张角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因头裹黄巾，作为标志，故称“黄巾起义”。黄巾军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吏不可畏，民不可轻”等革命口号，为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一。后来在东汉统治者和豪强地主武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

③董卓（？—192），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一个大军阀。一八四年，任并州牧，借口带兵去洛阳，废汉少帝刘辩，立

献帝刘协，自任丞相，残暴专横。后各地起兵反对，他挟持刘协西迁长安，纵火焚烧洛阳周围数百里，并纵容士兵任意杀掠，使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一九二年，他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为王允、吕布所杀。董卓大乱，指董卓为篡夺政权和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乱。

④党锢的纠纷，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横行不法，统治阶级内部的一部分士族官僚李膺、陈蕃、杜密等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本阶级的利益，和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猛烈地抨击宦官集团。一六六年宦官诬告他们结党“危害朝廷”，“诽讪朝政”，逮捕下狱，株连了二百多人。以后又三次捕杀党人，并命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以及五服内的亲属，都免官禁锢。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党锢之祸”，直到一八四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一致对付黄巾起义，才下诏赦免。

⑤曹操（155—220），即魏武帝，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期地主阶级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他崇尚刑名，以法治军，先后消灭了盘踞在黄河流域的吕布、袁绍、袁术、袁尚、袁谭、刘表、韩遂等世家豪族分裂割据势力。并大破与袁绍互相勾结的乌桓统治者。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为后来西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曹操继承了法家革新精神，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坚决革除东汉末年弊政，大胆破除旧的用人标准，公开向孔孟之道进行挑战，对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曹操对于文学也有较高的造诣，他的四言诗和一些乐府诗，慷慨激昂，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积极进取精神，表达了他对于革新事业的雄心壮志。他尚刑名，倡通脱，为魏晋文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

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曹操一开始就参与了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的罪恶活动，他同世家豪族的斗争是不彻底的，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也是不彻底的。因此，曹操死后不久，儒家守旧势力便乘机占了上风，曹操所推行的“法治”，很快就为“礼治”取代了。

⑥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清代浙江乌程（今吴兴县）人。曾搜集唐以前的文章，编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共七四六卷，内收作者三五〇二人的作品。后来他的同乡蒋鼐为作编目一〇三

卷，并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于一八九四年刊行。三代，指夏朝、商朝、周朝；上古，指三代以前。

⑦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祐，江苏无锡人。习医，曾到日本考察医学，后创办医学书局于上海。编有《说文解字诂林》、《文选类诂》、《佛学大辞典》、《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续编》等书。《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则辑录了自汉朝至南北朝的全部诗歌，共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刊行。

⑧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清末曾参加光复会活动，不久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出卖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与杨度等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阴谋称帝效劳，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所著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北大时编写的讲义，叙述汉魏之际至南朝的文学情况，书中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所辑录的关于魏晋时代的文学评论，可作为史料参考。

⑨刑名，即循名责实以定赏罚，这是法家法治的主要精神。《史记》称申不害、韩非“喜刑名之学”，《汉书》说宣帝“以刑名绳下”，曹操“尚刑名”，都是指法治而言。尚，即尊崇的意思。

⑩“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语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的《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说是“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意即：假使国家没有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

⑪清流，指自命清高的名士。

⑫又有一个人……。见《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写的《后汉书》中范丹的故事。范丹（112—185），又名范冉，字史云，东汉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人。他有一次去看姐姐的病，姐姐留他吃饭。他认为姐夫品德不好，离去时留下饭钱。他姐姐叫人送还给他，他把钱丢在地上就走了。

⑬曹操曾三次下令征求人才，表示用人唯贤。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所载二十二年令：“……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意思说，……倘有

不仁不孝而具有治国和指挥作战本领的人，都应把你们所知道的推举出来，不要遗漏。

⑭“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语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松之注引曹操《董卓歌辞》。郑康成（127—200），名玄，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博通诸经，为当时北海相孔融所推重，有“纯儒”之称。这句诗说，郑康成在给别人酌酒时，倒在地上死了。对郑颇有讽刺意味。

⑮遗令，古时帝王官宦临死前写给后人的命令。曹操的遗令有：“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见严可均所辑《全三国文》卷三。意思说，我的婢妾和伎人，都很勤苦，叫他们住在铜雀台，不要虐待她们。……我剩余的香料可以分给诸夫人……。诸妾没有什么可作，可学做鞋织布出卖。我原来当官时保存的印绶，要收藏好，我剩下的衣服被子，要另外藏一个地方，放不下的，你们兄弟可以分掉。”

⑯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西晋诗人。他在《吊魏武帝文》中批评曹操：“彼裘纓于何有，貽尘谤于后王”。是针对曹操的遗令说的。意思说，衣服和印绶有什么好说的呢？象这样的遗令，只能受到后世帝王的讥笑。

⑰方士，指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

⑱曹丕（187—226），即魏文帝，字子桓，曹操的次子。三国时魏国的建立者，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为帝。他爱好文学，主张开展文学批评，所作《典论》，是我国较早的文学批评著作。

⑲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的弟弟，封陈王，死谥陈思王，是魏建安时代的重要诗人。

⑳曹睿（ruì瑞，204—239），即魏明帝，字元仲。曹丕的儿子。能诗文，与曹操、曹丕并称魏之“三祖”，但文学成就远不及曹操、曹丕。

㉑“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诗赋要写得华丽，文章的优劣

主要是由作家的气质和文章的气势所决定的。

②② 类书，一种分门别类，加以编排的资料汇编性的书籍，便于征引和查考。唐宋时期编了不少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这些类书，保存了很多现已失传的古书的片段。

②③ 《文选》，南北朝时梁朝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编辑，故又名《昭明文选》。选录战国时期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

②④ “为艺术而艺术”，这是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一种超阶级超政治的虚伪的文艺观点，认为艺术应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的本身，不必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有关。与“为人生而艺术”相对立。实际上这种文艺是根本不存在的。

②⑤ “文章可以留名声于千载”，语出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品，……声名自传于后”。意思是说：“文章是有助于治理国家，使人不朽的伟大事业，所以古代作家的名声能够一直流传于后世。”

②⑥ “文章小道”，见曹植《与杨德祖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意思说，文章是不足道的，它既不能够宣扬大的道理，也不能留名于后世。

②⑦ “建安七子”，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即公元196—220年。“七子”是指这个时候七个著名的文人，他们是：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县）人，孔丘二十世孙。汉献帝时任北海相，他是汉末儒家思想的代表，后为曹操所杀。

陈琳（160—217），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人。先从袁绍，后归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曾任丞相（曹操）掾属军谋祭酒。

徐干（170—217），字伟长，北海（今山东寿光县）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曹丕）文学。

阮瑀（？—212），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曾任

司空军谋祭酒。

应玚(?—217)，字德琰，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人，曾任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

刘楨(?—217)，字公干，东平(今山东平阴、汶上县境)人，曾任丞相掾属。

⑳袁氏兄弟，指袁尚、袁谭、袁熙，是当时占据河北一带的军阀，后均为曹操所破灭。孔融讽刺曹丕取甄氏和反对曹操禁酒的事，见《后汉书·孔融传》及唐朝章怀太子李贤注。

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引自曹操《短歌行》。杜康，相传为黄帝时人，是酿酒的发明者，又相传为周朝人，善于酿酒，后世就以杜康作为酒的代名。

㉒曹操杀孔融，是当时一场激烈的儒法斗争，其经过见《后汉书·孔融传》及《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所载曹操宣布孔融罪行的令文。

㉓曹操处孔融死刑时，宣布孔融“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甔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贖活余人”。(《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意即说父母跟子女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父母不过是象盆(甔)一类的器具，子女则是寄放在这器具中的物体。父亲如果不贤，宁可养活别人。曹操把孔融的这些言论，作为不孝的罪状，把他杀掉，无非是借口而已。

㉔祢衡(173—198)，字正平，东汉末年平原(今山东平原县)人，是一个反动儒生。他与孔融、杨修结成一伙，相互吹捧，他吹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吹他是“颜回复生”。他屡次辱骂曹操，曹操便把他送到荆州牧刘表处，因侮慢刘表，又被送给江夏太守黄祖，为黄祖所杀。

㉕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县)人，魏晋时的玄学家，曹操的女婿。齐王曹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

㉖《老子》、《易经》：《老子》即《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期

老聃(李耳)所作,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兵书和唯心主义哲学著作,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易经》即《周易》,大约产生于殷周之际,是古代的一部占卜书、儒家最早的经典著作之一。

③⑤司马氏,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魏的末年,大臣司马懿专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又相继掌权。至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废掉了魏皇帝曹奂,建立晋王朝,自立为晋武帝。司马氏是曹操死后世族地主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③⑥巢元方,隋炀帝大业(605—618)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是一部很有名的医学著作。关于“寒石散”的服法和解法,详见该书《寒石散发候》篇。

③⑦扪(men门)虱而谈,这是晋人王猛的故事。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县)人,这故事见《晋书·王猛传》。大意是说,桓温北伐入关中,他穿着粗布衣服去见桓温,一面捉虱子、一面谈论天下大事。

③⑧葛洪(283—363),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司马睿为丞相时,他任咨议、参军等职。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赐爵关内侯。少学炼丹术,好神仙导养之法。所著《抱朴子》分内外二篇。内篇说,人能服气养神,制炼丹药,可得仙道。外篇论时政人事。关于服散的记载,见该书内篇。

③⑨关于服散作假和闻讳而哭,系根据《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及《世说新语·任诞》篇有关桓玄的记载。

④⑩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山阳(今山东邹县境)人,曾任尚书郎。魏晋时与何晏、夏侯玄等共同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玄学家。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道德经注》等。

④⑪夏侯玄(209—254),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爽表弟,历任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征西将军。后拟谋杀司马师并夺回被司马氏篡夺的权力,事泄被杀。鲁迅在下文误记为司马懿。

④⑫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篇“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刘孝标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240—248)。

④③ 《世说新语》，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撰。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等职。所著《世说新语》，内容是记述后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名流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梁朝刘孝标为作注释。

④④ “解散方”：指《解寒食散方》，徐叔和撰，共十三卷，见《唐书·经籍志》。又徐叔向撰《解寒食方》，共十五卷，见《新唐书·艺文志》。

④⑤ 皇甫谧(mì密，215—282)，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县)人，著有《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书。《晋书·皇甫谧传》记述他因吃散而所受的种种痛苦，甚至想操刀自杀，叔母劝阻乃止。

④⑥ “竹林七贤”，又称“竹林名士”。《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又《世说新语·文学》篇“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刘孝标注：“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涛)、向子期(秀)、刘伯伦(伶)、阮仲容(咸)、王浚中(戎)为竹林名士。”

④⑦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魏晋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与魏宗室通婚，崇尚老庄，曾任中散大夫，是“竹林七贤”中敢于蔑视权贵和反对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因对司马氏的专权不满，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昭所杀。他的著作《嵇康集》，鲁迅曾作校订。

④⑧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魏丞相掾阮瑀的儿子，曾任从事中郎、步兵校尉。性嗜酒，蔑视礼法，与嵇康齐名。著有《阮步兵集》。

④⑨ 刘伶(生卒年不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曾任建威参军。狂放不羁，好饮酒，作《酒德颂》。

⑤⑩《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他母亲死了，“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悻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青眼表示尊重，白眼表示鄙弃。

⑤⑪《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臧(zāng脏)，表扬、赞同；否(pǐ匹)指责，批评。意思是说：阮籍虽然不拘礼教，而说话空洞，对一切人、事都不置可否。

⑤⑫晋代常见儿子直呼父名的例子，如《晋书·胡母辅之传》说辅之的儿子谦之，直呼他的父亲的号彦国。又《王蒙传》，王蒙直呼他父亲的名字王文开。

⑤⑬《世说新语·任诞》篇：“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幠衣，诸君何为人我幠中？”幠：裤子。

⑤⑭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是借“大人先生”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胸怀。

⑤⑮“天地解兮六合开……”这三句的意思是说：宇宙从浑然一体而分解为上下四方，星辰时时在陨落，日月每天要落山，一切都在变动，一切都有尽头，我即使离开尘世，又有什么可怀恋的呢？六合，指天地和东、南、西、北四方。

⑤⑯《晋书·阮籍传》：“文帝（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⑤⑰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朝宋诗人，诗名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引颜延年之注语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意思说：阮籍在乱世做官，经常害怕受到诽谤，而遭祸患。因此他的诗，常常忧人生无常而嗟叹，虽然志在讥刺时事，而文字却很隐晦，后人很难猜测他的原意，所以只能粗略地理解其大意，对于隐晦的意旨，则只好从略了。

⑤⑧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语出《论语·学而》。说，音义均同悦，快乐的意思。意即学了《礼》《乐》《诗》《书》之后，又经常温习，不是很快乐的了吗？

⑤⑨ 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是反驳当时辽东太守张邈（字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作的一篇论文。同时，也是与孔丘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唱反调的。

⑥⑩ 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二人曾相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当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少，周公专擅王室，二人怀疑周公不利于成王，挟武庚作乱。周公于是诛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世人遂认为管叔、蔡叔不是好人。嵇康的《管蔡论》则提出了异议，为他们作了辩解，这在当时来说，是离经叛道的。

⑥⑪ 山巨源，即山涛（205—283），河内怀（今河南武涉县）人。他在魏常道乡公（曹奂）景元（260—264）年间为尚书吏部郎，欲举嵇康以自代，康写信给山涛表示拒绝，并和他绝交，这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信中自说既不受礼法之束缚，又不满商汤王、周武王，对周公、孔丘也不尊重，为世教所不容。后来又受他的朋友吕安案（吕安的哥哥控告吕安不孝，因此下狱）的牵连，钟会便劝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把他杀了。嵇康被杀的经过，《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的《魏氏春秋》记载颇详。

⑥⑫ 祖述，效法和尊崇前人的行为和学说。禅让，传让帝位。

⑥⑬ “忠”“孝”是封建统治者最主要的精神支柱，是直接用以维护、巩固封建政权的。“以孝治天下”，这是魏晋以来的封建统治者企图利用儒家所鼓吹的人以“孝悌”为本的封建伦理观念，来治理天下，维护其统治。

⑥⑭ 裴颀（wěi 伟，267—300），字逸民，晋代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惠帝时历任国子祭酒，尚书左仆射等职。曾奏修国学，并建议改定度量衡制，后为赵王司马伦所杀。他著的《崇有论》是反对何晏、王弼等玄学家的“贵无论”的。认为“无不能生有”，“有”是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基础，包含有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对“时俗

放荡，不尊儒术”，“口谈浮虚，不尊礼法”，很有反感。因而在肯定“有”，即肯定事物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论证了“长幼之序”，“贵贱之级”的绝对必要，又表现了儒家唯心主义思想的反动倾向。

⑥⑤孙盛（生卒年不详），东晋无神论者。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县）人。官至秘书监、加给事中。善言名理，与殷浩齐名。尝以“形既粉散，知亦如之”（意即人既然死了，他的知觉也就不存在了）的唯物主义观点，驳斥佛教“神不灭”思想。他在所著《老聃非大贤论》里，特别攻击当时的清谈家奉为宗主的老子，用老子自己的话证明老子学说的矛盾，不切实际，从而断定老子并非大贤。他的著作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

⑥⑥何曾（197—278），字颖考，魏晋时陈国夏阳（今河南太康县）人。曾参预司马懿与曹爽争权的政变和司马炎篡魏的活动。因他极力为司马氏效劳，西晋初，官至丞相，拜太尉，封公爵。他因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当着司马昭的面指责阮籍为“纵情背理，败俗之人”。并对司马昭说：“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司马昭怜其病弱，没有听从（见《晋书·何曾传》）。本文说“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当是误记。

⑥⑦“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语出《庄子·田子方》篇。温伯雪子去齐国，路经鲁国，有人要见他，他说：“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意思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君子，只知道背诵死的礼义的条文，而不善于了解人们的心理。文中季札应为温伯雪子。

⑥⑧直隶，现在的河北省。

⑥⑨《晋书·阮籍传》说阮籍的儿子阮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阮籍对他说：“仲容（阮咸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篇也有同样记载。

⑦⑩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为司马师兄弟所信任。公元262年，被任为镇西将军，次年领兵伐蜀，蜀平后，因谋反被杀。他去见嵇康时，受到冷遇（见《晋书·嵇康传》），因

此怀恨在心。后来嵇康入狱，他在司马昭面前极力主张把嵇康杀掉。

⑦①所举嵇康的《家诫》，据鲁迅校本，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倘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嵇康的儿子名绍，《晋书·嵇绍传》说他“十岁而孤”。

⑦②刘勰（xié协，？—520），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著有《文心雕龙》。“师心以遣论”，指嵇康不屈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发表议论。“使气以命诗”，指阮籍在诗歌中抒发自己的志趣，表现了不为世俗所拘泥的独特气概。

⑦③陶潜，参看《春末闲谈》注③。他的诗善于描写自然景色和朴素的农村生活。后世称他为“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有人说他浑身是“静穆”。鲁迅在本文中明确地指出：“他于世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后来在《题未定草（七）》中又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⑦④《陶集》，指陶渊明的诗文集。《述酒》一诗，据南宋人汤汉的考证，此诗是写东晋大臣刘裕为篡夺政权，阴谋杀害晋恭帝司马德文的事件的，表现了陶潜对当时政治现实并未忘怀。

⑦⑤墨子（约公元前478—392），即墨翟，春秋战国时代出身于“贱人”的思想家。他反对孔丘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以及“仁”和“正名”的反动观点，提倡“非命”，表现了唯物主义的进步倾向。但他讲“天志”和“明鬼”，相信鬼神，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宣扬阶级调和，仍有唯心主义落后的一面。

⑦杨子，即杨朱，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出生大概在墨子之后，是孟轲的前辈。他的学说是主张“为我”，提倡“重生”，“无为”。《孟子·尽心上》说：“杨子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意思说：如果牺牲自己的一根毛而能使整个天下都得到好处，他也不干。与墨子的主张“兼爱”正相反。他并没有著作流传下来，后人仅从《列子·杨朱》篇中略知他的学说的概。

评曹斥蒋 借古“慨”今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别具一格，它谈论魏晋而把锋芒指向用阴谋诡计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的屠夫蒋介石；它纵述文章的风度和文人的服药、饮酒，却处处联系政治。在中国文学史上，象鲁迅这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从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给以批判的总结，这还是第一篇。

这篇文章是一九二七年夏鲁迅应邀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讲演。当时，白色恐怖弥漫全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盘踞在广东的军阀接着进行了“四·一五”反革命的“清党”运动，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鲁迅也进行钉梢、监视，横加迫害。他们邀请鲁迅演讲，就是想趁机制造口实，以便对鲁迅下毒手。但鲁迅“横眉冷对”，毫不畏缩，他利用公开演讲的机会，“以古例今”，对巧取豪夺、用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诡计篡夺革命果实、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蒋介石一伙的罪行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在综述魏晋历史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变化和文章风格的时候，对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作了

深刻的分析，对魏晋时期主要文学流派和著名作家也一一作了评价，特别是对曹操的评价，十分精辟。今天学习这篇杂文，对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为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借鉴，是很有教益的。

关于曹操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和观点。一切尊儒反法的反动派都把曹操描绘成为阴险狡诈、凶恶残暴的“乱世奸雄”。宋元以后，更把他写进小说，搬上舞台，极力加以丑化，使他成为妇孺皆知的大花脸。鲁迅认为“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曹操所处的时代、阶级地位和实践活动，作了具体的分析，充分肯定曹操顺应历史潮流，革新政治的历史功绩和进步作用，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给曹操翻了案。

由汉末到东晋二百多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极端动荡的时期。汉末的“黄巾”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推动了历史前进。但在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以后，世家豪族却进一步扩张了自己的势力，不仅把持了东汉王朝的中央政权，而且各霸一方，形成一种割据分裂的状态，互相争夺，混战多年，生产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北方和江淮一带的豪强世族，抬出孔老二的僵尸，奉行儒术，大开历史的倒车。曹操用武力削平了袁绍、袁术和吕布等大小割据势力以后，继承了法家的革新精神，坚决反对儒家的倒退路线。在短短的十多年间统一了北方，为后来西晋的统一，打下了基础。鲁迅认为：“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

代”，“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作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思想代表，曹操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奉行了一条法家路线。他对于复辟势力改变法家路线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警惕，他杀边让、诛孔融就是明证。鲁迅在这篇文章里紧紧扣住这条线索，概括了曹操统治下政治上和思想上推行法家路线的两大特色——尚刑名和倡通脱，并且对曹操推行这条路线的政治背景以及它的影响都作了十分中肯的剖析，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儒法斗争的规律。

为什么曹操要崇尚刑名呢？这是“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为什么曹操要提倡通脱呢？因为不这样便无法打破儒家思想的垄断，“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鲁迅在这里观察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事实上正是由于曹操崇尚刑名，立法很严，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严明的作风，影响到文章方面也形成了清峻的风格；更因力倡通脱，“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把汉末腐儒自命“清流”，标榜“名节”等等颓风，一扫而光，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倒退路线以致命的一击，为魏晋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鲁迅说魏晋“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采”，曹操“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围绕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魏

晋时代的文学流派如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以及东晋诗人陶渊明等人的文学活动都作了评述，文章的结尾还以陶渊明为例，反复论证一切文艺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那种完全超出于政治的“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世间的诗文也是没有的。鲁迅一方面把魏晋文人服药、饮酒和当时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论述了魏晋文人反礼教的精神；一方面指出魏晋以孝治天下，只不过是以儒家所谓“孝悌”作幌子，用这块遮羞布来掩盖它“巧取豪夺”的真面目，有力地揭露了儒家礼教的腐朽本质和当时统治阶级提倡“孝悌”之道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然后，笔锋一转，打了一个比喻，对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人民的罪行和他所耍弄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巧妙地作了揭露和批判。鲁迅明讲的是北方军阀，隐喻的是国民党反动派。但读者一看就会明白，那个背叛革命、背叛新三民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蒋介石。鲁迅旁敲侧击，把蒋介石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耍弄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鬼蜮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鲁迅曾经说过，他“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这段“以古例今”的比喻，正象匕首投枪，直刺敌人心脏，显示了鲁迅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面前克敌制胜的高度的斗争艺术和大无畏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篇杂文，特别明显地体现了鲁迅杂文的战斗风格。

述香港恭祝圣诞^①

记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② 圣诞，香港恭祝，向称极盛。盖北方仅得东邻鼓吹，此地则有港督督率，实事求是，教导有方。侨胞亦知崇拜本国至圣，保存东方文明，故能发扬光大，盛极一时也。今年圣诞，尤为热闹，文人雅士，则在陶园雅集，即席挥毫，表示国粹。各学校皆行祝圣礼，往往欢迎各界参观，夜间或演新剧，或演电影，以助圣兴。超然学校每年祝圣，例有新式对联，贴于门口，而今年所制，尤为高超。今敬谨录呈，乞昭示内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国主义者：——

乾 男校门联

本鲁史，作《春秋》^③，罪齐田恒^④，地义天经，打倒贼子乱臣，免得赤化宣传，讨父仇孝，共产公妻，破坏纲常伦纪。

堕三都，出藏甲^⑤，诛少正卯^⑥，风行雷厉，铲除贪官悍吏，训练青年德育，修身齐家，爱亲敬

长，挽回世道人心。

坤 女校门联

母凭子贵，妻借夫荣，方今祝圣诚心，正宜遵懍三从⑦，岂可开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误会自由，趋附潮流成水性。

男禀乾刚，女占坤顺，此际尊孔主义，切勿反违四德⑧，动说有乜所谓，有乜所谓，至则不知所谓，随同社会出风头。

埋犹言合，乜犹言何，有犹言无，盖女子小人，不知雅训，故用俗字耳。舆论之类，琳琅尤多，今仅将载于《循环日报》者录出一篇，以见大概：——

孔诞祝圣言感

佩 蘅

金风送爽。凉露惊秋。转瞬而孔诞时期届矣。迺来圣教衰落。邪说嚣张。礼孔之举。惟港中人士。犹相沿奉行。至若内地。大多数不甚注意。盖自新学说出。而旧道德日即于沦亡。自新人物出。而古圣贤胥归于淘汰。一般学子。崇持列宁马克思种种谬说。不惜举二千年来炳若日星之圣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诋人也。不曰腐化即曰老朽。实则若曹少不更事。卤莽灭裂。不惜假

新学说以便其私图。而古人之大义微言^⑨。俨如肉中刺。眼中钉。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孔子且在于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诞之可言。呜呼。长此以往。势不至等人道于禽兽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经教犹存。当此祝圣时期。济济跽跽^⑩一时称盛耶。虽然。吾人祝圣。特为此形式上之纪念耳。尤当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伦理。重实行。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皆有轨道之可循。天不变道亦不变^⑪。自有稿^⑫凿之理由在。虽暴民嚣张。摧残圣教。然浮云之翳。何伤日月之明。吾人当蒙泉剥果^⑬之余。伤今思古。首当发挥大义。羽翼微言。子舆氏谓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⑭。生今之世。群言淆乱。异说争鸣。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与圣教为难者。向只杨墨。就贵词而辟之。为吾道作干城。树中流之砥柱。若乎张皇耳目。涂饰仪文。以敷衍为心。作例行之举。则非吾所望于祝圣诸公也。感而书之如此。

香港孔圣会则于是日在太平戏院日夜演大尧天班。其广告云：——

祝大成之圣节，乐奏钧天，彰正教于人群，
欢腾大地。我国数千年来，崇奉孔教，诚以圣道

足以维持风化，挽救人心者也。本会定期本月廿七日演大尧天班。是日演《加官大送子》《游龙戏凤》。夜通宵先演《六国大封相》及《风流皇后》新剧。查《风流皇后》一剧，情节新奇，结构巧妙。惟此剧非演通宵，不能结局，故是晚经港政府给发数特别执照。演至通宵。……预日沽票处在荷李活道中华书院孔圣会办事所。

丁卯年八月廿四日， 香港孔圣会谨启。

《风流皇后》之名，虽欠雅驯，然“子见南子”^⑮，《论语》不讳，惟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者，能知此意耳。余如各种电影，亦复美不胜收，新戏院则演《济公传》四集，预告者尚有《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新世界有《武松杀嫂》，全系国粹，足以发扬国光。皇后戏院之《假面新娘》虽出邻邦，然观其广告云：“孔子有言，‘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予改是’^⑯。请君今日来看《假面新娘》，以证孔子之言。然后知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所以不愧称为万世师表也。”则固亦有裨圣教者耳。嗟夫！乘桴浮海^⑰，曾闻至圣之微言，崇正辟邪，幸有大英之德政。爱国劬古^⑱之士，当亦必额手遥庆，恨不得受一廛而为氓^⑲也。专此布达，即颂 辑祺。

圣诞后一日，华约瑟谨启。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六期，署名华约瑟。后编入《三闲集》。

②这是封建统治者给孔丘的谥(shì示)号(死后的名号)。唐代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给孔丘加上“文宣王”的谥号，到了清朝顺治二年(1645)又谥孔丘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③《春秋》，参看《有趣的消息》注②。

④《论语·宪问》载：“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陈恒就是田恒，是当时齐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公元前四八五年(鲁哀公十四年)杀了齐国奴隶主贵族头子齐简公，孔丘站在维护奴隶制的立场，认为陈恒以臣“弑”君，是“乱臣贼子”，所以请求鲁哀公出兵去讨伐他。

⑤孔丘做鲁司寇时，看到鲁国奴隶主统治摇摇欲坠，代表新兴地主势力的孟孙、叔孙和季孙三家掌握实权，自建都城，俨然象个国家。孔丘对这种情况不能容忍，便向鲁定公进言：要使“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才可以巩固统治；并派他的学生子路到季孙氏那里去做官，用计堕毁了叔孙氏的郈(hóu侯)都和季孙氏的费(bì闭)都，只有孟孙氏的成都比较坚固，没有被堕毁掉。甲，指甲兵，即包括有铠甲和兵器的武备。雉，古代以城长三丈高一丈为雉。

⑥诛少正卯，参看《有趣的消息》注⑬。

⑦三从，儒家把妇女当作男子的附属品，自己没有独立的人格。所以《仪礼·丧服》规定女子“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就是所谓“三从”。

⑧四德，儒家认为妇女必须遵守的四德，即所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见《后汉书·皇后纪》及李贤注。

⑨大义微言，这是儒家们吹捧孔孟之道的話，认为孔孟的言论，精深而含有重大的义理。

⑩济济跄跄(qiàng枪)，人数众多拥挤的意思。

⑪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汉代的儒家代表、反动思想家董仲舒所宣扬的唯心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意思是：有意志的天，是永恒存在而不变的，由它的意志产生出来的“道”与“理”，也是永远不变的。

⑫稿，即“确”字。

⑬蒙泉剥果，蒙、剥，皆《易经》的卦名。蒙指愚昧无知，剥指剥落，即衰落的意思。封建卫道者诬蔑反对尊孔读经，是愚昧的源泉，造成衰落的恶果。

⑭孟轲（约公元前372—289），字子舆，孔丘反动学说的继承者和鼓吹者。这里引他的话，见《孟子·滕文公下》。杨、墨，指杨朱和墨翟。杨朱主张“为我”，墨翟主张“兼爱”，各成一派。由于他们持有和孔丘不同的意见，所以孟轲恶毒地骂他们是“无父无君”的“禽兽”；鼓动“圣人之徒”去反对他们。

⑮《论语·雍也》载：“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是春秋时卫灵公的老婆。孔丘周游到卫国，她派人对孔丘说：“四方来的人，想见国王的，必定要见见我。”孔丘为要达到做官行“道”的目的，就去见她，向她行“稽首”的最敬礼。子路知道此事以后，很不高兴。孔丘赶忙赌咒，说：我如果有不正之心，天都不容！天都不容！

⑯孔丘的这几句话，见《论语·公冶长》。最后一句应为“于予与改是”。予，指他的学生宰予；这几句话是因宰予而发的。

⑰乘桴浮海，参看《老调子已经唱完》注⑥。

⑱劬（qú渠），勤劳。劬古，为保古效劳的意思。

⑲语出《孟子·滕文公上》：“愿受一廛而为氓”廛（chán缠），市镇，居民众多的地方。氓，百姓。意思是，愿得到一块住的地方，成为那里的百姓。

中外反动派串演尊孔丑剧的真相

——读《述香港恭祝圣诞》

一九二七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鲁迅敏锐地抓住在香港粉墨登场恭祝圣诞的尊孔丑剧中一些典型材料，采取让事实说话，以材料作证的手法，用给《语丝》记者写信的形式，写成了《述香港恭祝圣诞》这篇杂文。通过辛辣的讽刺，把这幕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和媚外卖国的尊孔丑剧真相揭露无遗，戳穿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反动派鼓吹尊孔的罪恶目的。

一九二七年，是刽子手、卖国贼蒋介石发动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国内外反动派和遗老遗少们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一再掀起尊孔的逆流恶浪。作为当年蒋介石的后台老板之一的英帝国主义，则通过香港殖民当局，不仅直接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革命者，而且对当时中国反动派的复古崇洋活动煽风点火，极力叫好，使五四运动以来受到猛烈冲击的“孔家店”又活跃起来，尊孔祀圣，一时甚嚣尘上。这就是在“港督督率”下，那年的圣诞“尤为热闹”的背景。

因为这一年的尊孔丑剧是和反革命复辟的屠杀暴行直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特别显得杀气腾腾。鲁迅在杂文中首先

抓住这个特点，运用两条门联、一篇文章的材料，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超然学校男校门联公然叫嚷：“打倒贼子乱臣，免得赤化宣传，讨父仇孝，共产公妻，破坏纲常伦纪”；女校门联则威胁妇女，不准“随同社会”，“趋附潮流”，“正宜遵儆三从”，“切勿反违四德”。署名佩衡的文章更恶毒诅咒“暴民嚣张，摧残圣教”，狂热地号召一切反动分子为孔孟之道“作干城”，把“列宁马克思种种谬说”一律“辟除净尽”。真是群魔乱舞，凶相毕露，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可是中外反动派这样煞有介事地大演其尊孔丑剧，恰恰把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用心，暴露得明明白白！

这一年香港的尊孔丑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洋古合一。鲁迅接着在文章里列举了香港孔圣会等反动社团“行祝圣礼”“以助圣兴”时公演的种种电影戏剧节目，如典型的殖民地化的粤剧《风流皇后》，充满封建色彩的影片《济公传》，还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品《假面新娘》等等。沉渣竞泛，华洋合流，表面看来，颇觉不伦不类，其实不然。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用事实揭露了这种反动同盟的实质，香港殖民当局大演尊孔丑剧，其目的，“不过是利用”来“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和统治；而蒋介石拿起孔丘这块“敲门砖”，妄图敲开复辟的大门，也正是为了要进一步投进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鲁迅这篇文章最后辛辣地讽刺说，中国的反动派，十分懂得帝国主义的这种意图，“当亦

必额手遥庆，恨不得受一廛而为氓也”。简直把此辈迫不及待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

学习鲁迅这篇杂文，回顾历史的经验，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识破林彪反党集团和他们的主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鼓吹孔孟之道的目的，认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场新的华洋串演的尊孔丑剧的真相，从而决心把批林批孔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

革命文学^①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②，德国的霍普德曼^③，西班牙的伊本纳兹^④，中国的吴稚晖^⑤。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⑥；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

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⑦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⑧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⑨，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⑩，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⑪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⑫，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

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民众旬刊》第五期。后编入《而已集》。

②唐南遮（1863—1938），通译邓南遮，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作家，其作品多鼓吹侵略战争。

③霍普德曼（1862—1946），通译霍普特曼，德国反动戏剧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曾纠合德国一些反动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④伊本纳兹（1867—1928），一译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运动的领导人，曾被西班牙政府监禁。

⑤吴稚晖（1868—1958），字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反动政客，早期曾宣传无政府主义，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九二七年承乘蒋介石意旨，以“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呈文，主张用血腥的白色恐怖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⑥指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文人孔圣裔等组织的“革命文学社”所鼓吹的所谓“革命文学”。在他们的刊物《这样做》第二期刊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规定：“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员，……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为宗旨。”他们的所谓“革命文学”，其实是反共反革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

⑦措大，又作醋大，旧社会对贫寒的知识分子的轻蔑称呼。

⑧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宴散》一诗中的诗句，形容当时剥削者的

奢侈豪华的生活。宋朝词人晏殊曾评论这两句诗说：诗里没有用“金”、“玉”之类字眼，却表现了富贵气象。见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⑨鞞（pí皮）鼓，古代军队中的一种战鼓。

⑩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都用古人诗中的一句，前面加“赋得”二字，作为诗题。清朝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韵。这里是比喻那些只有革命词句而无革命内容的作品，就象科举时代的试帖诗一样是空洞的八股。

⑪叶遂宁（1895—1925），通译叶赛宁，俄国诗人。十月革命时，一度向往革命，写过《苏维埃俄罗斯》等反映革命的作品。但由于没有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世界观没有根本转变，不久又陷入悲观失望，终于在一九二五年自杀。

⑫梭波里（1888—1926），俄国小说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后，虽曾一度接近革命，但终因未能克服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以致苦闷徬徨，于一九二六年自杀。

根本问题是做“革命人”

——读《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是一篇正确阐述作家的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
决定作用的杂文。

一九二七年，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时候，经历了一场严酷的阶级斗争，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一年四月，紧接着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鲁迅亲眼看到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他本人也受到严重的压迫。他原先一向相信的进化论被激烈的阶级斗争“轰毁”了，他的思想进一步向阶级论跃进。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使他深刻认识到立场问题对于革命作家的重要意义。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两种所谓“革命文学”：一种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指挥刀的掩护之下”鼓吹的“革命文学”，一种是某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家脱离革命实际，空喊“革命”口号的“革命文学”。鲁迅的《革命文学》一文，就是针对这两种“革命文学”而作的。

这篇杂文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鼓吹的“革命文学”的法西斯反动实质，指出他们所谓的“革

命”，其实就象北洋军阀叫嚷的“讨赤”一样，同是反共反人民的货色；他们所谓的“革命文学”根本不是什么文学，而是“莫名其妙”的东西。文章同时严厉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空喊“革命”口号的错误倾向，指出这些人既脱离实际斗争，又脱离革命队伍，“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大叫“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而“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这种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革命文学”。

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文学？鲁迅在文章里未作具体阐述。但他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这里说的是作家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作家都是根据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去观察生活和进行创作，表达本阶级的思想愿望，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作家没有革命的立场和世界观，就不可能写出为革命服务的革命文学来，即使“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上海文艺之一瞥》）正如作者同年四月在黄埔军校的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过的，只有“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用这个著名的极为形象的比喻，深刻地说明了作家的世

界观与文艺创作的关系。

鲁迅以俄国诗人叶遂宁和小说家梭波里的自杀为例，进一步说明作家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一个作家，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立场和世界观问题，即使自以为“愿为革命尽力”，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学家，甚至还会走到革命的对立面去。据说，叶遂宁在十月革命时曾经高喊过“万岁，天上的和地上的革命！”并宣称自己是一个布尔塞维克；梭波里也曾努力接近革命。可是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却感到“活不下去”，自杀了。本来，在爆发革命的年代，一个作家如果同广大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反动统治的重压之下，“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是有可能做革命文学的。可是叶遂宁梭波里却在革命成功之后感到“活不下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这类人是带着个人主义的幻想来看待革命，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没有改变过来，他们所幻想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共同之处。在革命后，看到实际情形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回事，于是失望了，颓废了，“活不下去了”。他们终于不是什么革命文学家。回顾一下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归根结蒂，还不是因为这些人的立场和世界观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始终不是一个“革命人”的缘故吗？

鲁迅在这篇杂文中还提到“但‘革命人’就希有”。这正是针对当时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满足于空喊“革命”口号，脱离实际斗争，不重视世界观改造的现象提出

来的。他指出，这种脱离革命斗争实际的“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说得何等深刻，多么发人深省。鲁迅后来一再告诫革命作家要通过参加实际的社会斗争等途径来进行思想改造，使自己成为革命人。鲁迅本人，就是在实际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自我解剖，不断改造世界观，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典范。

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毛主席又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当我们学习毛主席这些教导的时候，重读鲁迅《革命文学》一文，感到格外亲切，并进一步认识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积极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在斗争中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做一个真正的“革命人”，才能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不但对革命作家来说是这样，对一切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人来说，也不能例外。

文学和出汗^①

上海的教授^②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③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④了。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⑤。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⑥？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⑦，类猿人^⑧，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

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⑨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⑩。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⑪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⑫，汗不敢出^⑬。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二七，一二，二三。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五期。后编入《而已集》。

②上海的教授，指买办文人梁实秋。他是浙江杭县人，反革命的国

家社会党党员，买办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新月社”的骨干分子，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梁实秋是美国反动文艺评论家白璧德的忠实门徒，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狂热鼓吹者。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所写的《文学批评辨》一文里说：“人性根本是不变的”，“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唯一之标准”。“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本文就是针对梁实秋的这些谬论而写的。

③ 莎士比亚（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代表剧作有《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等。这些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④ “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这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话，我国亦常用这话来讽刺那些莫名其妙的言论。

⑤ “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是成语“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口语化。鲁迅用以揭露梁实秋的强盗逻辑。

⑥ 欤（yú于），古文中表示疑问、感叹、反问等语气的助词。

⑦ 类人猿，即古猿，这里指人类的祖先，生活于一百万年到一千五百万年以前。

⑧ 类猿人，即由古猿发展而成的最早的人类，生活于五十万年到六十万年以前。

⑨ “弱不禁风”、“蠢笨如牛”，梁实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复旦旬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说：“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参阅鲁迅的《而已集·卢梭和胃口》。

⑩ “岌岌乎殆哉”，语本《孟子·万章》篇。岌岌（jí及），形容危险。殆（dài代），危险。

⑪ 俄国文学，指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作家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现了某些同情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⑫痉挛 (jīng luán 京峦)，由于神经受到刺激而引起的肌肉紧张收缩。

⑬汗不敢出，语出《世说新语》：“战战栗栗，汗不敢出。”形容极度恐惧紧张，连汗也不敢出了。

回击“人性论”的第一枪

——读《文学和出汗》

鲁迅的著名杂文《文学和出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一篇重要文献。它批驳“人性论”所涉及的问题，远不局限于文学的范围。今天读来，对于识破包括刘少奇、林彪在内的一切阶级敌人鼓吹“人性论”，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目的服务的罪恶阴谋，仍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期，鲁迅对以反动教授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进行了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批判斗争，彻底揭露了他们提出的“人性论”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本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原先依附北洋军阀后来投靠蒋介石的买办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新月社”，充当了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先是梁实秋抛出《文学批评辩》一文，用从美国反动文艺理论家白璧德那里捡来的破烂“人性论”作为武器，向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进攻。他胡说什么“人性根本是不变的”，“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等等。其目的是妄图以此来抵制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传播，阻挠文化革命的深入，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给予坚决的反击。《文学和出汗》就是回击梁实秋的第一枪。此后，鲁迅还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一系列文章，同坚持鼓吹“人性论”的新月派进行毫不调和的持久斗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促进左翼文艺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学和出汗》一开头，便把梁实秋的“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会久长”的反动论点及其论据——即所谓莎士比亚等人因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拿出来当靶子。鲁迅抓住这个论据中的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反问道：那些作品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一击就把论敌的论据摧毁，其论点也就不能成立。鲁迅进一步把梁实秋的“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的荒谬“文学论”和“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的反动“历史论”相提并论，深刻地揭露了梁实秋的“文学论”是为“抢得天下的”蒋介石法西斯王朝服务的。

鲁迅接着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人性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进行层层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他先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正确指出：人类是进化的，“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然后又以出汗这种日常现象为例，并针对梁实秋在另一篇文章中把社会上的人划分为“聪明绝顶的人”、“蠢笨如牛的人”等荒谬说法，说：“譬如出汗罢，……

‘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形象地划清了阶级社会中当牛做马的劳动人民与吮膏吸血的剥削者的阶级界限。既然现实生活中有“香汗”与“臭汗”之分，那么，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的文学，自然就有“描写香汗”的资产阶级文学和“描写臭汗”的无产阶级文学之别，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的文学。鲁迅指出，梁秋实所谓的那种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的文学，其实还是“描写香汗”的资产阶级文学，是“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这就尖锐地揭露了“人性论”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实质，剥掉了梁实秋之流脸上的假面具，使他们的资产阶级走狗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鲁迅在这篇杂文中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还是描写臭汗好？”和“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鲁迅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他说英国的小说，先前是写香汗的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鲁迅在这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出一个真理：随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及其政治力量的日益强大，文艺这块地主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终将为无产阶级所取代。只有表现和歌颂劳动者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才有生命，只有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文学家才能对文学作出贡献。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确实是必须“先行解决”的根本立场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有可能被“人性论”者的“道士论道”所迷惑，走到邪路上去。

关于鲁迅四十多年前对梁实秋“人性论”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已作了结论。毛主席说：“**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象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但是，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总是有沉滓泛起。建国以后，先是刘少奇、周扬鼓吹“全民文艺”，后是林彪兜售“咖啡文学”，都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在新形势下的死灰复燃，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我们还要警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我们要学习鲁迅，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识破打着任何旗号出现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并进行彻底的批判。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①

—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②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③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④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⑤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仿句^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

呢？”

新月社的声明^⑦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⑧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

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⑨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⑩，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⑪……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⑫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⑬，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⑭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

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⑮，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⑯。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

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①7}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A B C 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①8}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饿它就会长大了，象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

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①⑨}，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已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②⑩}，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②⑪}，元译上谕^{②⑫}，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

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⑳。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㉑，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㉒里，专读《古文观止》^㉓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象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

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斯基²⁷，蒲力汗诺夫”²⁸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²⁹的三篇论文和托罗兹基³⁰的半部《文学与革命》，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思牛克斯”³¹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³²，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思”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

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③③}，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望。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菜阿^{③④}说地体运动，达尔文^{③⑤}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③⑥}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③⑦}。”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

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占优越的地位，无产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⑳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㉑那会

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④。 “汽笛呀！” “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 “一切人呀！” “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④。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托尔斯泰④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④，志行吐属④，过于贵族。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

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歌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越了阶级，而无意识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⑤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

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④⑥}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④⑦}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何况所译的文是诗^{④⑧}。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珂德^{④⑨}》，法兑耶夫的《溃灭》^{④⑩}，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⑤①}，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

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⑤的恶意。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知识分子，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⑥，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

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但这好象“中日亲善，同存共荣”^⑤之说，从羽毛未丰^⑥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

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象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⑤，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⑥。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糊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⑦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

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⁵⁸，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⁵⁹先生现在是开书铺，印 Hauptmann 和 Gregory 夫人⁶⁰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⁶¹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⁶²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⁶³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⁶⁴。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⁶⁵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

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⑥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Z^{⑥⑦}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⑥⑧}。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

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⑥⑨}，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⑦⑩}，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象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六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⑦，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⑧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⑨。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⑩，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⑪，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

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编入《二心集》。

②指新月社，一九二三年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陈源（西滢）、梁实秋等所组成的文学团体。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转而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一九二八年出版《新月》月刊，竭力宣传他们的反动政治主张，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③这一期《新月》刊载的所谓“争‘言论自由’的文字”，有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等。又有该社“同人”《敬告读者》一文，说：“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实际上新月社所主张的“言论自由”是指地主资产阶级而言，至于人民群众是不允许有言论自由的。

④梁实秋，参看《文学和出汗》注②。

⑤《文学与批评》，苏联文艺理论家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论集，鲁迅曾翻译此书，一九二九年出版。

⑥仞（lè勒）句，语法术语，又称分句或子句。

⑦《新月》创刊号《“新月”的态度》一文中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这完全是新月社有意放的烟幕。

⑧《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是梁实秋宣扬人性论，反对阶级论

的主要作品之一，载于《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

⑨Proletary, 英语, 即无产者; 普罗列塔利亚是英语Proletariat的音译, 即无产阶级。

⑩《韦白斯特大字典》, 是当时英美流行使用的大字典, 以编者韦白斯特(1758—1843)命名。

⑪这句英语的意思是: 无产者是最低阶级的公民, 这个阶级不以财产为国家服务, 而只是以生孩子为国家服务。这是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侮辱和诬蔑。

⑫罗马时代, 指公元前二七年——公元二八四年罗马帝国时期。

⑬“舍密”, 是古法语Chemie的音译, 意为“炼金术”, “舍密学”今译为化学。

⑭梁实秋的“梁”字, 也可作“桥梁”解。

⑮优生学, 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说。否定阶级社会中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 胡说剥削制度下的阶级不平等是人或人种在生理上和智力上的不平等, 完全是由他们不同的遗传本性决定的。

⑯白璧德(1865—1933), 美国反动文艺批评家, 提倡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中心, 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的“新人文主义”, 主张象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那样复兴欧洲古典文艺, 用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抵制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梁实秋是白璧德的门徒, 他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 就是宣传白璧德的谬论的。

⑰杨妃, 即唐明皇的宠妃杨贵妃。岁寒三友, 指松、竹、梅。

⑱《搬家》, 凌叔华(陈西滢的妻子)作的小说, 载《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

⑲荷兰语和德语同属日耳曼语系, 俄语和波兰语则属斯拉夫语系。

⑳《史》、《汉》, 指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 都是古代的史书。《书经》又名《尚书》, 是我国上古时代的史料书。

⑳唐译佛经，我国的佛经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从东汉末年开
始，唐代最盛。当时最著名的是玄奘主持的长安弘福寺的佛经翻
译，共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多为直译。

㉑元译上谕，上谕即旧时皇帝的诏令。元朝统治者规定皇帝诏
令、朝臣奏章、官府文书都必须使用蒙文，附以汉文的译文，亦
多直译。文句往往保有了原文的语法结构，有的词则用译音，
对后来的汉语词汇和语法，颇有影响。

㉒“于我如浮云”，语出《论语·述而》，意即事情好比天上的
浮云一样，跟我毫无关系。

㉓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评论家。他的文艺论集
《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有鲁迅的译本，分别于一九二
四、一九二六年出版。

㉔三家村，泛指人口稀少的偏僻的小乡村。最早见宋代陆游
《村饮示邻曲》诗：“偶失万户侯，遂老三家村。”

㉕《古文观止》，是清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一部由
先秦到明代的文集。选文二百二十二篇，共十二卷，在旧社会
流传甚广。

㉖卢那卡夫斯基（1875—1933），苏联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
十月革命后，任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

㉗蒲力汗诺夫（1856—1918），通译普列汉诺夫，俄国早期的
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一九〇三年以后，堕落为修正主义者和社会
沙文主义者，成为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
早期，他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写过包括《论艺术》、《原始民族
的艺术》和《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三篇论文的《没有地址的信》
一书。鲁迅译他此书中的三篇论文，再加上他的《论文集〈二十
年间〉第三版序》编成《艺术论》一书出版。

㉘婆格达诺夫（1873—1928），通译波格丹诺夫，俄国唯心
主义哲学家，马赫主义者。他企图以“经验一元论”来篡改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主义》一书中对他的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⑩托罗兹基，通译托洛茨基，参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注⑩。

⑪这是国民党反动政客吴稚晖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谬论。

⑫万喙息响，喙(huì会)，鸟嘴。这里是说众口都出声了。

⑬梁实秋这段话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

⑭格里莱阿(1564—1642)，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主张研究自然界必须进行系统的观察和实践，使自然科学的研究得到重要发展。他最早证实地球绕太阳运行，推翻了形而上学的地球中心说。

⑮达尔文，参看《有趣的消息》注⑭。进化论学说的创造人。一八五九年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指出物种是可变的；对生活的适应性也作了正确的解释，从而推翻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生物不变论，给宗教以严重的打击。恩格斯认为：达尔文进化理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即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之一。

⑯卢梭(1712—1778)，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主要作品有《民约论》，教育小说《爱弥儿》等。

⑰这段引文和下面的引文，都见于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

⑱交易所，即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商人进行大宗商品、股票、债券等交易的场所。折本，即蚀本、亏本。投机商人遇到自己囤积的货物、股票和债券跌价就得亏本。

⑲指经营石油的垄断资本家。

⑳焦大和林妹妹都是《红楼梦》中的人物。焦大是封建贵族家庭贾府的仆人；林妹妹即林黛玉，是贾府中的贵族小姐，二人所属的阶级不同，不会相爱。

㉑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污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说：“如其‘烟囱呀！’、‘汽笛呀！’‘列宁呀！’便是无产阶级文学，那么，无产阶级文学就用不着什么理论，由它自生自灭罢。”鲁迅在这里进行了反击。

④②托尔斯泰，参看《未有天才之前》注⑦。

④③约翰孙（1709—1784），英国古典主义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家境贫困，曾一人编纂最早的一部《英语词典》。

④④志行，志向、品行；吐属，言谈。

④⑤成仿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

④⑥钱杏邨，即阿英，太阳社主要成员之一。引语见《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一文。为了给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辩护，故意曲解卢那卡尔斯基的话，说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有时它是足以鼓动大众的”，“我们是不得不予以相当的估价的”。《拓荒者》原为太阳社的文艺月刊，蒋光慈主编，“左联”成立后，成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

④⑦台明·培特尼（1883—1945），通译杰米扬·别德内依，苏联讽刺诗人。

④⑧《被解放的堂·吉珂德》，卢那卡尔斯基的剧本。

④⑨法兑耶夫（1901—1956），通译法捷耶夫，苏联作家。《溃灭》、通译《毁灭》，描写俄国国内战争时期一支红军游击队同反革命匪帮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有鲁迅的译本。

④⑩格拉特珂夫（1883—1958）通译革拉特珂夫，苏联作家。他的小说《水门汀》（又名《士敏土》）今译《水泥》。

④⑪布尔乔亚，法语bourgeois的音译，即资产阶级。

④⑫亚历舍·托尔斯泰（1883—1945）、威垒赛耶夫（1867—1945）、普理希文（1874—1954），都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已有一定影响，十月革命后仍继续从事创作活动的作家。

④⑬这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而提出的欺骗口号。

④⑭羽毛未丰，不成熟的意思，有如幼鸟尚未长齐羽毛。

④⑮腠（còu 凑）理，是肌肤间的纹理。不中腠理，指未能对准肌肤纹理进行解剖，引申为未能击中要害。

④⑯这都是对鲁迅的攻击。《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诬蔑鲁迅是“资

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又说：鲁迅和西滢长虹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一九二八年四月创刊的《战线》周刊曾攻击鲁迅“满口黄牙”。

⑤7 Prometheus，即普罗米修士。参看《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注②。

⑤8 《文艺政策》，鲁迅编译，包括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联共（布）关于文艺政策的两个文件和苏联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的决议。一九三〇年出版。

⑤9 郑伯奇，创造社成员。

⑥0 Hauptmann，即霍普特曼。参看《革命文学》注③。

Gregory夫人即格列高里夫人（1852—1932），英国戏剧家。

⑥1 《文艺生活》，创造社主编的周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创刊。

⑥2 鲁迅译过两种《艺术论》，一是卢那卡尔斯基的美学论文，一九二九年出版；一是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文集，一九三〇年出版。

⑥3 输诚，投降。

⑥4 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中，诬蔑鲁迅说：“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过‘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这一类的讽刺。”

⑥5 片冈铁兵，日本作家。一九二四年前后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六年后曾宣称转向进步文艺阵营。

⑥6 《申报》，旧中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日报。一八七二年四月由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后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⑥7 蒋光Z，即蒋光慈（1901—1931），原名蒋光赤，安徽六合人，太阳社主要成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改“赤”为“慈”，鲁迅讽刺他为“蒋光X”、“蒋光Z”，“X”、“Z”都是未知数，就是说不知变为蒋光什么了。

⑥8 藏原惟人（1902— ）当时日本左翼文艺评论家、理论家。

⑥⑨ <一周间>，苏联里别进斯基的长篇小说，以国内战争为题材。蒋光慈译，一九二五年出版。

⑦⑩尼采（1844—1900），德国极端反动的哲学家，鼓吹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认为意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是法西斯“思想家”的先驱。

⑦⑪指新月社在《新月》月刊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提出的所谓“健康”和“尊严”的“两大原则”。他们以此来攻击当时进步的文艺界。

⑦⑫参看《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注③⑧。

⑦⑬见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月刊第二卷六、七期合刊的《敬告读者》。

⑦⑭指一九二九年十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因胡适作《人权与约法》，决议令教育部对他“加以警诫”。

⑦⑮《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隆基作，亦载《新月》月刊第二卷六、七期合刊号。

“人性论”的彻底破产

——读《“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是鲁迅继《文学和出汗》一文后，对新月派反动文人梁实秋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全面批判的战斗檄文，也是鲁迅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杰出篇章。这篇杂文包括论“硬译”和论“文学的阶级性”两个论题。本来这是两个互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但在鲁迅笔下却融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心内容就是批判“人性论”，宣传阶级论。

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其目的是妄图以此来向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进攻，抵制和阻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充当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一九二七年后，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深刻认识到，非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思想武器，就不能击溃敌人的文化“围剿”，发展革命的文艺运动。但是，在当时，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革命文艺运动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很不重视，很少介绍。于是，鲁迅便亲自动手翻译，而且字斟句

酌，力求精确表达原著，为革命文艺阵营输送武器，同时也以此来“煮自己的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梁实秋之流对此大为恐慌，配合其主子国民党反动派查禁马列主义书刊，以“论硬译”为名，疯狂攻击鲁迅的翻译“读起来比天书还难”，是“死译”，狂叫“此风断不可长”。这是关于翻译方法问题的讨论吗？不是，完全不是。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实秋所谓“此风断不可长”者，是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断绝其生命”。这就彻底剥光了梁实秋《论硬译》披着的“学术”伪装，把他的罪恶的政治目的揭露无遗。鲁迅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他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不但不会博得梁实秋之流的“爽快”，而且会给他们以“不舒服”，甚而至于“气闷，憎恶，愤恨”。

正如鲁迅在文中指出的，梁实秋的《论硬译》其实是他另一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两篇文章一个目的：妄图以“人性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以鲁迅便把矛头对准“人性论”，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鲁迅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段著名的论述，以无可辩驳的社会现实，揭示出阶级社会中“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小杂感》）的客观实际，从而证实梁实秋以“共同人性”为理论基础的“人

性论”的极端虚妄。

既然阶级社会中的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那么，反映人们的立场、观点、感情、要求的文学也就必然烙上阶级的印记。鲁迅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作家的创作，“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从理论上有力地驳斥了梁实秋攻击无产阶级“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的荒唐说法，论证了所谓“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的叫喊，其实是矛盾而空虚的梦呓。

鲁迅与敌人论战，从来不作“纯理论”的辩论，他总是从阶级本质上深刻揭露敌人的政治阴谋，一击而中敌要害。梁实秋叫嚷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循常规”，胡说一个无产者只有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爬上有产阶级去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才算“有出息”。鲁迅尖锐指出，这套新的说教，其实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的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梁实秋之流“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这就彻底地揭露了“人性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本质和政治阴谋，表明“人性论”的鼓吹者梁实秋之流不过是资本家的走狗。这样把文艺上的“人性论”和政治上的阶级调和论联系起来进行揭露和批判，充分表现出伟大共产主义者鲁迅思想的杰出之处。

“文学有阶级性”，“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

‘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这就是鲁迅和“人性论”斗争所得到的结论。它有助于我们识别各种不同标记的“全民”牌黑货。

毛主席教导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因此，承认不承认文艺的阶级性，承认不承认文艺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工具，这是在文艺问题上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之流叫嚷“文艺要为各种人所接受”，鼓吹“要引起所有人的共鸣”的“全民文艺”，叛徒、卖国贼林彪贩卖人人可以享用的“咖啡文学”，万变不离其宗，全都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花样翻新，其要害是抽掉文艺的阶级内容，抹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合二而一”，妄图以资产阶级文艺取代无产阶级文艺，从而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鲁迅在文中针对梁实秋为了避免资产阶级文学被打倒而说“新兴文学”在文学领域中可以“有它的位置”的欺骗，明确宣告：“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这一点对我们今天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特别有启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

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为了不断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不但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而且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让我们不停顿地向资产阶级进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①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晒^②。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

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③，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④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⑤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因是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能
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⑥，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

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晒。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⑦，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⑧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⑨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⑩时用争存说⑪，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⑫，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⑬，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

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编入《二心集》。

②不值一晒，参看《现在的屠杀者》注②。

③叶永蓁，又名叶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个师长。早年著有自传体小说《小小十年》，鲁迅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为此书做过校阅工作，并写了一篇《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三闲集》），肯定书中主角有倾向革命的一面，同时指出这个青年还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虽然有一定的革命性，但那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并不彻底。

④乌托邦，拉丁文utopia的音译，意即“乌（无）有之乡”。源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小说《乌托邦》。小说描述了设想在乌托邦岛上建立的一个没有剥削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乌托邦”一词后来成为“空想”的同义语。

⑤《申报》，参看《“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注⑥。

⑥饕餮(tāo tiè滔帖)，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恶兽。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后称贪食嗜饮曰饕餮，通常用来比喻贪食的人。饕(yàn厌)，食饱。肥甘，美味食品。饕餮者饕足了肥甘，就是贪食的人吃腻了肥美的食物。

⑦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颓废派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恶之花》，诗中歌咏死亡，描写病态心理，充满悲观厌世，憎恶革命的情绪，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所引起的精神危机和思想混乱的反映。

⑧成仿吾，参看《“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注④。

⑨驳诘，驳，驳斥，诘(jié洁)，责问。

⑩互助说，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主张互助，反对竞争的互助论学说。

⑪争存说，指英国唯物主义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

⑫密达，法国长度单位meter的音译，我国称为米(公尺)。

⑬“允执厥中”，语见《尚书·大禹谟》。允，恰当，执，掌握，厥，与文言文的“其”字同义。“允执厥中”即恰当地掌握事理的中正之处，不偏不倚，也就是儒家宣扬的所谓“中庸之道”。

透过假象 看清实质

——读《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极“左”假象怎样掩盖右的实质的杂文，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三月。鲁迅通过对当时文学界有关长篇小说《小小十年》的评论中出现的极“左”倾向的批判，有力地戳穿了那些“急进革命论者”的假面，揭示出其“非革命”的右的实质。

当时，资产阶级保守派报纸《申报》和左翼刊物《拓荒者》，“左”右合流，在《小小十年》的评价问题上都摆出一副“急进革命”的脸孔，并借此对鲁迅进行攻击。那些“急进革命论者”要求“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晒”。鲁迅透过现象看本质，指出他们的言论乍看似乎很彻底，其实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他们貌似彻底的革命者，“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

鲁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革命力量在阶级斗争中成长、壮大、发展的必然过程和客观规律，对鼓吹革命队伍必须纯之又纯的极“左”论调，进行

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下，不可能也不容许把革命队伍“完全”训练好了，然后再来革命。革命队伍的突起，参加者的“终极目的”可能是极为歧异的，但“反抗现状”这一点则大略相同，所以在革命行进时，也就会“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这种现象无损于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如果要求每一个战士的思想意识都必须十分正确，否则就拒他们于革命队伍之外，势必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赶到敌人那边去。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使我们吃过这个亏，有过许多教训。要求革命队伍“纯之又纯”的“急进革命论”，说来好听，却起了瓦解革命力量的作用，最终是取消革命，危害性极大。所以鲁迅称之为“毒害革命的甜药”。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中国革命就是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清除叛徒、内奸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而胜利前进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鲁迅关于“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的论断无比正确。

鲁迅进一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剖了“急进革命论者”的阶级本质和思想根源。他指出，所谓“急进革命论者”是这么两种人：一种是“没有一定的理想和能力”的颓废者。他们要求“纯粹”、“彻底”，为的是找“刺激”，图“爽快”，而不是为革命。他们是“纸张上的革命家”。鲁迅说，

临到革命来时，这种人就会“撕掉他先前的假面”。另一种是顽固地守着旧营垒的诡辩家。这种人好象“毫无定见”，其实反动立场非常坚决。他们发起议论来，“左”右逢源，随机应变，而“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他们要求一切改革都必须“十分完全，并无缺陷”，其目的无非是要人们“毫不动弹”，维持“现状”。这两种人的出发点虽有不同，但他们的“急进革命论”的毒害作用则是一样的，那就是反对改革，取消革命，维护剥削阶级的罪恶统治。这就从根本上剥开了“急进革命论者”的貌似彻底革命的“躯壳”，显示出了其有害革命的“灵魂”。

在当前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重读鲁迅这篇杂文，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怎样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透过假象看本质，深刻认识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极右实质，通过革命大批判，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①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②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

“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③，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④诸文学家，以及

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⑤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⑥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⑦，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⑧和爱伦堡^⑨，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⑩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⑫，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

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⑬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⑭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⑮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

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他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

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①⑥}，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①⑦}和太阳社^{①⑧}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①⑨}。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②⑩}我的，然而他终于

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⑲，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⑳。所谓韧，就是不要象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㉑，原是“进学”^㉒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㉓，借以进了“秀才举人”^㉔，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斯基^㉕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象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象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注 释：

① 本篇是作者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后编入《二心集》。

② Salon，法语，音译为沙龙，即客厅或会客室。十七、八世纪西欧贵族、资产阶级谈论文学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社交集会，多在沙龙举行。这里所说的“Salon的社会主义者”，是指那些只是在房子里空谈社会主义，而不去接触实际的口头革命派。

③ 墨索里尼（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头目，与德国的希特勒同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一九四五年溃败后，被意大利自由志愿军处死。

④ 新月派，参看《“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注②。

⑤ 邓南遮，参看《革命文学》注②。

⑥ 浪漫谛克，英语 romantic 的音译，意为“浪漫的”，也就是脱离实际，耽于幻想的意思。

⑦ 叶遂宁，参看《革命文学》注①。

⑧ 毕力涅克（1894—？），通译皮涅克，苏联革命初期被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同路人作家之一。十月革命后，他虽然在政治方面接近革命，但仍然保留旁观中立的创作态度，并未摆脱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后来便逐渐趋向反动。

⑨ 爱伦堡（1891—1967），原是俄国资产阶级反动作家，一九〇五年混入革命队伍，不久便当了逃兵。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投机回到苏联，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曾受到当时苏联革命文艺界的严厉批判。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他疯狂地追随苏修叛徒集团，相继抛出了《解冻》等大毒草，恶毒地诬蔑斯大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成为苏修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吹鼓手。

⑩ 南社，一九〇九年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成立的文学团体，拥有社员一千余人。名为南社，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曾出版《南社丛刊》，用诗文鼓吹革命，反对清政府。辛亥革命失败后，内部逐渐分化，有的附和袁世凯，有的加入段祺瑞的安福系和梁启超的研究系等反动政客集团，坚持进步的只是少数人，因此该社便无形散掉。

⑪ 汉官威仪，语出《后汉书·光武帝纪》。原是汉朝官吏的服饰制度。这里是指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某些反清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们怀着复古主义思想，希望在推翻清王朝以后，恢复汉族统治时期的一些封建制度。

⑫ 峨（é俄）冠博带，峨，高。博，宽阔。头戴高帽子，腰束宽衣带，指古代士大夫的装束。

⑬ 海涅（1797—1856），德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和政论家。一八四三年和马克思相识，并在马克思影响下写成出色的政治讽刺诗集《时代诗歌》。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感到痛苦失望，诗作中有时流露出徬徨苦闷的情绪。本篇所引见海涅诗集《还乡记》第六十八首小诗，内容与原诗略有出入：

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
昂然地在天堂高坐，

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
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

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
和天使们一起欢宴，
我享受着这些珍品，
却无须破费一个小钱。

⑭ “有出息”者，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文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说：“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斗争手段。”实际上就是要劳动人民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不要起来造反。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里曾予以驳斥。

⑮ 《溃灭》，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西伯利亚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在日本干涉军和白军包围下进行顽强斗争。鲁迅翻译这部小说时最后改译为《毁灭》。美谛克是小说中的一个读过高中的知识分子，参加游击队后，由于未能摆脱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自高自大，与工农出身的游击队员相处，总是格格不入；而对新的环境和战斗任务，又无法应付，以致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后来在游击队危急的关键时刻，受不起考验，开了小差。

⑯ 指“左联”机关刊物和“左联”成员所办的刊物《大众文艺》、《文艺讲座》、《萌芽》、《拓荒者》、《文艺研究》等。

⑰ 创造社，一九二一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组织的新文学团体。在新文学运动中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起初倾向于反帝反封建的积极的浪漫主义，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文艺思想有所转变，提出了“形式上是写实主义，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又增加了一批新的成员，大力提倡“革命文学”。然而在瞿秋

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理论脱离实际，并错误地攻击鲁迅，故有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闭。

⑱ 太阳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由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等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与创造社一道提倡“革命文学”，攻击鲁迅。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后自动解散。

⑲ 空城计，原为戏曲传统剧目，取材于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诸葛亮据守空城，镇定自若，使司马懿疑有埋伏，因而退走的故事。后来“空城计”一语，一般借来用以形容并无实力，却虚张声势的那种做法。

⑳ 狙（jū 居），猴类的一种。狙击，即乘人不备，突然袭击。

㉑ 指鲁迅所支持和领导的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艺术团体。

㉒ 韧（rèn 刃），是指柔软而又坚固，不易折断的一种物性。这里是说在文艺战线上要做出成绩来，就得锲而不舍，从事经久持续的奋斗。

㉓ 八股文，参看《老调子已经唱完》注⑤。

㉔ 进学，封建科举时代，以童生考取生员（即秀才），称为进学。

㉕ 起承转合，是做八股文的一种公式化的布局方法。“起”就是开头，“承”就是承接上文，“转”就是转折，“合”就是结束。

㉖ 秀才举人，明清两朝，考入县学的人叫秀才，考中乡试（省考）的人叫举人。

㉗ 卢那卡尔斯基，参看《“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注⑳。

革命作家必须投身实际斗争

——读《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一九三〇年，正当蒋介石对革命人民发动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时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主要发起人之一。

“左联”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时，担任了“左联”领导的周扬等人，在政治上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文艺思想上则鼓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套。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是当时真正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战斗纲领，也是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思想斗争的一篇重要文献。

在这篇讲话里，鲁迅针对“左联”成员的实际情况，尖锐地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为什么呢？鲁迅认为，首先是因为有些作家“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其次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又“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还不是无产阶级的。鲁迅强调了作家参加实际的社会斗争的重

要性，他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鲁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那些理论脱离实际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左右摇摆的思想实质，作了深刻的揭露。

当时参加“左联”的成员，大都是没有经过思想改造和实际斗争锻炼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读书人”，他们远离工农大众的生活和斗争。然而，其中有些人却狂妄地宣称“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唯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家”。他们满足于“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看起来“高雅得很，漂亮得很”，其实“毫不足靠”。鲁迅把这种人叫作“纸张上的革命家”，并指出等到革命来时，他们便会撕掉先前的“不自觉的假面”。

鲁迅在谈到革命与文艺的关系时，曾一再强调立场对于作家的重要性。早在一九二七年，他在《革命文学》中便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并用了“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个著名的形象的比喻，深刻地说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的血肉关系。

当然，无产阶级立场的获得，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绝不是“关在玻璃窗内”所能做到的。因此，鲁迅在这篇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参加“实际的社会斗争”，也就是说，要在改造

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否则，所谓“左翼”，就会成为右翼。后来“左联”中某些人，不就在白色恐怖下变成敌人的走卒了么？

鲁迅关于作家必须深入实际斗争，了解革命实情，反对作家去做“高于一切人”的精神贵族，这些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放射着不灭的光辉，对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仍然是我们在文艺领域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有力武器。试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对于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其中一个重要的和惯用的手段，就是诱使作家脱离工农兵群众，脱离三大革命斗争实际，把他们引导到“三名三高”的邪路上去。刘少奇鼓吹的“坐汽车体验生活”，林彪贩卖的“边看、边想、边写、边改”，目的都是妄图把文艺工作者引向脱离三大革命斗争的死胡同，以便被他们俘虏，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服务。现在，他们的阴谋虽然已经破产了，但是，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战斗还要继续下去。一切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从鲁迅这篇讲话中汲取精神力量，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前提下，作出新的成绩来。

答北斗杂志社问^①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教程”和“小说作法”^②。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③，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④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⑤，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

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
编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后编入《二心集》。

《北斗》，“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一年九月创刊，一九三二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勒令停刊，共出八期。

②“小说教程”、“小说作法”，指当时某些资产阶级作家教授指导青年怎样写小说的有关著作和讲义。

③宿见，固有的见解。

④模特儿，英语model的音译，原意为模型，指艺术家进行绘画、雕塑创作时所选取的造型的参考对象，或练习绘画技巧时的描写对象。文学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即所谓原型，也称为模特儿。

⑤Sketch，英语，速写，散文体裁之一，即用短小的篇幅，简练的文笔，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中人物或事件的一个片断。

发扬无产阶级的战斗文风

——读《答北斗杂志社问》

《答北斗杂志社问》是鲁迅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提倡无产阶级战斗文风的一篇重要文章。

三十年代初期，鲁迅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激烈战斗中，为了提高左翼文艺队伍的战斗实力和论争本领，乃借回答“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征询“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问题的机会，写了这篇短文。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谈论创作小说的方法，而是运用马列主义总结他自己多年来参加文艺斗争和创作实践的经验，提出写作的基本规则，处处显出鲁迅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一九四二年整风时曾把它编入《宣传指南》作为整风文献。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这篇光辉著作中，还列举了文章的内容，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并且针对当时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恶劣的资产阶级文风，号召我们学习鲁迅反对新旧八股的革命精神，彻底扫荡党八股这种纳垢藏污的防空洞。

《答北斗杂志社问》概括了八条写作的基本规则，它首先

提出“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鲁迅从唯物论反映论出发，阐明了写作和实践的依赖的关系，强调文章来源于变革社会现实的实践。这里，所谓“留心”就是要开动机器，细心观察；“各种事情”就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多看看”就是要广泛接触社会。也就是说，只有深入实际，深刻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才能取得丰富的创作材料，反映“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等等。至于“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这是从反面进一步强调“留心各样事情”的重要意义，反对不调查，不研究，全凭主观臆想拼凑文章。所以鲁迅提出“留心各样的事情”，“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正是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从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风。

鲁迅还要求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而且“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强调文章必须言简意明，通俗易懂；写完后要反复琢磨，认真修改。充分表明了鲁迅为人民群众而写作的观点和严肃的写作态度。毛主席曾经指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鲁迅的许多文章，短小精悍，鲜明生动，表达出十分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这除了他对事物认真研究外，跟他文章写完后反复琢磨也是分不开的。一篇好文章的产生，不是靠作者“笔下生花”，而是靠调查研究，靠对具体事物具

体分析。鲁迅提出文章要反复修改，也正是从认识论的高度回答文章要怎样才会好，在文风问题上，贯穿了一条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风是为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有什么样的阶级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文风。我们党的历史上围绕着文风问题的斗争，从来就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林彪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竭力散播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风。这种文风，和他们的反动世界观是一致的。都是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先验论为其理论基础，否认精神对物质的依赖关系，鼓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他们公开宣传文章是“灵感”的产物，是头脑里固有的东西。因此他们就按其反革命的需要，随心所欲，瞎吹一气，完全不顾客观实际。他们时而装腔作势，高唱什么“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时而故弄玄虚，散播一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谬论，甚至生造一些“关系重大，不是小，不是一般，而是特别重大”之类的词句，颠三倒四，愚弄群众。今天，我们在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必须以鲁迅为榜样，发扬无产阶级战斗的文风，彻底扫荡林彪散布的新八股，使修正主义没有藏身的地方。

论“第三种人”^①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②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③，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④。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

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⑤，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⑥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⑦，还没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

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⑧；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⑨，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预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

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⑩，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

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⑪，弗罗培尔^⑫。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⑬，达文希^⑭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⑮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⑯

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了！

“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文化月报》第一卷第一期及十一月一日《现代》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后编入《南腔北调集》。

“第三种人”，三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反动文学派别。首要分子为苏汶（即杜衡），附和者有韩侍桁、杨邨人、施蛰存等，他们自认为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是属于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第三者。他们鼓吹“文艺自由”，反对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诽谤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充当了可耻的帮凶。

②“论客”，指托派分子胡秋原，他曾打着普列汉诺夫的旗号，冒充马克思主义者，而又自命为“自由人”，说“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还诬蔑中国工农红军为“土匪”。

③见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他说：“要作家们去写一些有利的连环图画和唱本来给劳动者们看。……恐怕每一个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都要反对，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

④“资产阶级的走狗”，也是苏汶在同文中捏造的话。他说他们“第三种人”“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导者们算出命来，派定他是那一阶级的走狗”。

⑤指苏汶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和十月《现代》月刊第三期与第六期《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及《“第三种人”的出路》两文。施蛰存、苏汶是该刊的编辑。

⑥“左而不作”，这是苏汶对左翼作家的诬蔑。他在《“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里把他们写不出作品而“搁笔”的责任归咎于左翼作家的批评，说什么“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还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

⑦“克服了三年”，这也是苏汶在上文中攻击左翼作家的话。他说：“固然有人高唱着克服什么什么的根性和偏见。但是克服了三年还没克服好吗？”

⑧“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这是苏汶对左翼作家的无耻捏造。他在《“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里说：“容我说句笑话，连在中国这样野蛮的国家，左翼诸公都还可以拿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作品去从资本家手里换出几个稿费来呢。”

⑨“同路人”，指那些在世界观上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可以跟无产阶级同走一段路的人。这个词，本来是一九二〇年前后苏联评论界用来称呼以“谢拉皮翁兄弟派”这个资产阶级文学团体为代表的作家的。

⑩作梗（gěng耿），阻挠。

⑪托尔斯泰（1828—1910），参看《未有天才之前》注⑦。

⑫弗罗培尔（1821—1880），又译福楼拜。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长篇小说。

⑬密开朗琪罗（1475—1564），又译米开朗琪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雕塑家和画家。代表作有《大卫》、《摩西》、《创世纪》和壁画《最后的审判》等。

⑭达文希（1452—1519），通译达芬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把科学认识和艺术幻想结合起来，使当时绘画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代表作《最后的

晚餐》，以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和戏剧性的冲突构图著称，《莫娜丽莎》则是世界美术史上有名的肖像画之一。不过他与密开朗该罗的作品，大多以《旧约》、《新约》为题材，具有浓厚的宗教宣传的色彩。

⑮ 《旧约》，基督教《圣经》的前一部分，大约是公元前一千多年间有关犹太民族的历史、诗歌、法律、寓言等的文集。《新约》是耶稣及其门徒的言行纪录。因为《圣经》的前一部分，是犹太教继承下来的，犹太教称《圣经》是神与人立的约，故称《旧约》。而后一部分，基督教认为是基督降世后神与人新立的约，故称《新约》。

⑯ “才会有工作的勇气”，以及下文“怎么办呢？”都是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的话。

“一个心造的幻影”

——读《论“第三种人”》

在现实世界上，究竟存不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的“第三种人”？四十多年前，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观点，作了绝妙的回答：“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这是对自称为“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所谓“第三种人”苏汶之流的辛辣讽刺和嘲笑。

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反动派眼看“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相继破产，反革命文化“围剿”遭到惨重的失败，于是改变策略，指使“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先后出面，打着“中立”的旗号，继续围攻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苏汶表面上也和胡秋原“论辩”几句，实际上却是狼狈为奸。他在《关于“文新”和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种人”的出路》等文中，竭力支持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标榜做“第三种人”，鼓吹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鲁迅针对苏汶的反动谬论，写了《论“第三种人”》这篇具有重大战斗意义的杂文。

苏汶口口声声宣称，他是“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俨然超出于激烈的阶级斗争之外。鲁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运用阶级分析，无情地剥去了他的假面。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剿”，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左翼刊物，全被摧残”。但是，面对这些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苏汶却闭口不谈，反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蔑左翼作家“从资本家取得稿费”，攻击左翼文艺运动“专制横暴”，使他们这些“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不得不搁笔”。十分明显，苏汶的“不偏不倚”是假，为国民党反动派开脱罪责是真。一经戳穿，所谓“第三种人”，却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走狗，他们那一套“中立”的伪装和超阶级、超现实的说教，不过是一块自欺欺人的遮羞布罢了。

在这篇杂文里，鲁迅还抓住“第三种人”的“搁笔论”，从根源上进行了剖析，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三种人”所以“搁笔”，并非由于左翼文坛的批评，而在于做不成“第三种人”，因此，“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这就把“第三种人”“搁笔”的真实原因深刻地揭露出来，指出“第三种人”与“搁笔”之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从而也揭露了他们企图嫁祸于左翼文坛的卑鄙伎俩。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作家都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他的作品，也必然反映阶级的利害，受所属阶级利益的制约。鲁迅正是运用这一阶级观点，就作家与阶级、作家与现实、

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对苏汶的谬论进行了层层剖析。他抓住苏汶的自相矛盾的地方，深刻地指出，苏汶虽自称“第三种人”，却根本不可能超阶级、超政治、超现实。请看：

“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这说明他的作品不能摆脱“阶级的利害”；其次，苏汶“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可见他是“离不开战斗的”；再次，他在创作“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这也证明他是“跳不过现在的”。鲁迅以铁的事实和透辟的分析，击中了“第三种人”的要害，进一步把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宣告了“第三种人”以及他们鼓吹的超阶级文艺的彻底破产。

鲁迅通过阶级分析，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这一结论，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阐明在阶级社会中，作家和文艺跟阶级和阶级斗争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作家总是离不了一定的阶级属性，他的作品，总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的。鲁迅的论述，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阶级地位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这种打上了阶级烙印的思想意识，也必然反映到言行中。任何“超阶级”的说

教，其实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心造的幻影”。鲁迅当年和“第三种人”斗争的宝贵经验，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在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去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揭穿形形色色的敌人玩弄的花招，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学匪”派考古学之一）①

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例如“缠足”罢，从明朝到清朝的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这事起源的迟早的文章。为什么要考究这样下等事呢，现在不说他也罢，总而言之，是可以分为两大派的，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大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实，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过不缠之足，样子却还要古，学者应该“贵古而贱今”②，斥缠足者，爱古也。但也有先怀了反对缠足的成见，假造证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汉朝人做《杂事秘辛》③，来证明那时的脚是“底平趾

敛”。

于是又有人将这用作缠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说既然“趾敛”，可见是缠的了。但这是自甘于低能之谈，这里不加评论。

照我的意见来说，则以上两大派的话，是都错，也都对的。现在是古董出现的多了，我们不但能看见汉唐的图画，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坟里发掘出来的泥人儿。那些东西上所表现的女人的脚上，有圆头履④，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汉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⑤，头是尖尖的，平常大约未必穿罢，舞的时候，却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⑥似的踢开去之际，也不至于为裙子所碍，甚至于踢下裙子来。那时太太们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敛”的。然而伎女的装束，是闺秀⑦们的大成至圣先师⑧，这在现在还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⑨“摩登女郎”⑩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

碧玉”^⑪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⑫的时代了。

当民国初年，“不佞”^⑬观光北京的时候，听人说，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盖即今之所谓“摩登”也）的时候，是从脚起，上看到头的。所以男人的鞋袜，也得留心，脚样更不消说，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包脚布”的原因。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鷟作的《朝野僉载》^⑭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然而好象终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绵绵不绝，民元革命^⑮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专攻考“古”学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⑩，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⑪。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⑫。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⑬，从此主张运动的紧

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⑳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㉑，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㉒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㉓，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说：坐在家里，不大走动的人们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历国，运动王公，该可以不生病证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错误。盖当时花旗白面^㉔，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

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②5}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②6}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②7}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②8}”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②9}；三月一日《大晚报》^{③0}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口（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当局派驻邮局检查处检查员查获，当将索诈信截留，转辗呈报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

以“考古”为限的。

三月四日夜。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十三期，署名何干。后编入《南腔北调集》。

“学匪”派，一九二五年间，在女师大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的运动中，北洋军阀的走狗、反动文人陈源之流，曾辱骂鲁迅及其他支持女师大进步学生斗争的教员为“学匪”“学棍”。鲁迅在这里自称“学匪”派，是对陈源之流的讽刺和反击。鲁迅又曾把自己的书房叫作“绿林书屋”，也是这个意思。

②鲁迅引用这句话是讽刺儒家“厚古薄今”的倒退思想。

③《杂事秘辛》，古小说，旧题无名氏撰，实为明朝杨慎（字升庵）所作。写的是关于汉桓帝刘志选妃的故事。

④履（lǚ），鞋子。

⑤屣（xǐ），也是鞋子。“利屣”，尖头鞋。

⑥“潭腿”，拳术的一种，相传由清朝山东龙潭寺的和尚所创，所以叫做“潭腿”。

⑦闺秀，旧时称所谓贤淑而有才学的妇女为闺秀。

⑧大成至圣先师，原是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给孔丘的崇高的谥号，鲁迅在这里说伎女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是对孔丘及其门徒的蔑视和嘲讽。

⑨炎汉，即汉代。秦汉方士附会古代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以五行相生、相胜之德，为王者受命之运。汉高祖刘邦是所谓以火德而称王，所以叫“炎汉”。

⑩摩登，英语modern的音译，意为时髦、新式；“摩登女郎”，即时髦女人。

⑪“小家碧玉”，贫寒家庭的少女。语出乐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⑫脚坛，旧时称文艺界为文坛，这里的“脚坛”是一种幽默的说法。

⑬“不佞”，佞（nìng宁去声），才智；不佞是旧时的谦称，即“不才”之意。

⑭《朝野僉载》，唐朝张鷟作，一说此书原本已佚，由后人掇拾成编，内容系记载唐朝的故事和琐闻。

⑮民元革命，即辛亥革命。

⑯“中庸”，即孔丘提出的“中庸之道”。参看《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注⑩。

⑰“食肉寝皮”，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食其肉而寝处其皮。”意思是吃他的肉，剥下他的皮当被褥，形容对敌人仇恨极深。

⑱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而发出的丧心病狂的反动谬论。

⑲高而富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一种以杓形球棒击弹性小球入穴的球戏。高而富是英语golf的音译。

⑳语出《论语·子路》。这段话的意思是：不能与行中庸之道的人相交，则只好与狂放或狷介的人相交；狂放的人急于进取，狷介的人洁身自好，过于拘谨。孔丘这段话是说狂狷都不如中庸，以此鼓吹中庸之道。

㉑“割不正不食”，见《论语·乡党》，即不吃切得不正的肉。

㉒“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见《论语·乡党》，意思是：要吃最精美的食物，肉片要切得很细。

㉓“不撤姜食”，见《论语·乡党》，即食不离姜的意思。

㉔花旗白面，即美国面粉。旧时称美国旗（星条旗）为花旗，亦以“花旗”代称美国。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农业生产凋敝，每年从美国进口大批面粉。

⑳ “读书得间”，即读书时经思考而有所悟的意思。“得间”，语出《孟子·告子》。

㉑ 《申报》，参看《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注㉑。

㉒ “中执委会”，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㉓ 启迪，启发，开导。

㉔ “忘八”，旧社会流行的俗语，即忘记了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概括了封建道德要义的八个字的最后一个字的意思，也就是“无耻”的意思。

㉕ 《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在上海创刊的国民党反动报纸。

彻底剥掉“中庸之道”的画皮

——读《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鲁迅这篇杂文的题目，初看有点费解。其实这个题目很能表现鲁迅在文中自始至终以锐利的讽刺笔调，无情地戳穿孔老二炮制的“中庸之道”的深刻内容。

孔老二在炮制“中庸之道”的时候，曾经把这一奴隶主阶级的反动哲学装扮成最高的美德，欺世惑众，作为复辟奴隶制的思想武器。两千多年来，它成为一切反动派逞凶杀人时的蒙面纱和面临没顶之灾时的救命稻草。因此，剥掉“中庸之道”的画皮，就成为革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鲁迅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就是一篇彻底剥掉“中庸之道”的画皮的杂文。

这篇杂文写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正加紧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妄图把我国完全变为它的殖民地。蒋介石反动派在侵略者面前，无耻地执行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为了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

血腥统治，他顽固地拒绝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日要求，一面调遣百万大军，向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把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和青年大批投入监狱，横加杀戮；一面大肆鼓吹“中庸之道”，高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企图掩盖他们卖国投降的可耻行径和残杀人民的法西斯罪行。鲁迅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反动派虽然常常自吹爱“中庸”，行“中庸”，“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对于革命人民，对于进步力量，“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这正是对蒋介石之流的丑恶面目的深刻揭露。

鲁迅在解剖反动派大呼“中庸”的目的时，用他那锋利无比的讽刺的笔，先从明清以来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中国女人缠足起源的文章谈起，借题发挥，从女人的脚“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这种愈来愈小、愈来愈极端的现象中，引出中国历代反动派其实并不中庸的发人深思的结论。接着又从中庸之道的祖师爷孔老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不撤姜食”，推定孔老二晚年生了胃病；而且生动地刻画他“周游历国”时，“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坠得大起来”的狼狈相，对历代反动派的“俨然道貌的圣人”大大揶揄了一番，使人读来非常痛快。

对于历代反动阶级为什么如此起劲鼓吹“中庸之道”，鲁迅指出，“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

缺，这才想起他所需。”这句话深刻地揭示出一条真理：反动派的统治地位越是岌岌可危，越是需要用“中庸之道”来挽救自己。他们“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华盖集·通讯》）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克己复礼”，也极力鼓吹“中庸之道”，叫嚷“中庸之道……合理”，“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同时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我国人民的反修斗争。剥掉他们的画皮，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一伙原来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哪里有半点“中庸”？！就在他们大喊“中庸”的时候，背地里却阴险毒辣地炮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甚至丧心病狂地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凶残横恣，莫此为甚。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剥掉林彪及其一伙鼓吹的“中庸之道”的画皮，把它揭深批透，彻底肃清流毒。

华德焚书异同论^①

德国的希特拉^②先生们一烧书，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都比之于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③。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④，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儿；始皇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所以我们从“剧秦”^⑤的遗文中，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

希特拉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⑥……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

阿刺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

的图书馆⑦，那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⑧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才是希特拉先生们的嫡派祖师——虽然阿刺伯人也是“非德国的”——和秦的烧书，是不能比较的。

但是结果往往和英雄们的豫算不同。始皇想皇帝传至万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农书和医书，而秦以前的这一类书，现在却偏偏一部也不剩。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彩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竟要自由不要⑨？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

这回是不必二世，只有半年，希特拉先生们的门徒们在奥国一被禁止，连党徽也改成三色玫瑰了⑩。最有趣的是因为不准叫口号，大家就以手遮嘴，用了“掩口式”。

这真是一个大讽刺。刺的是谁，不问也罢，但可见讽刺也还不是“梦呓”，质之黄脸干儿们，不知以为何如？

六月二十八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署名孺牛。后编入《准风月谈》。

②希特拉（1889—1945），通译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担任德国内阁总理后，疯狂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残酷镇压革命力量，扼杀进步文化活动，焚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一切“非德意志思想”的书籍。

③秦始皇（公元前259—210），姓嬴，名政，秦朝开国皇帝。公元前二四六年即位，二二一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他在完成和巩固统一的过程中，实行过一系列“厚今薄古”的措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秦始皇所建立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遭到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反动儒生们的无耻诽谤和猖狂攻击。他们利用《尚书》、《诗经》以及包括孔丘言行录《论语》在内的儒家著作，“道古非今”，制造复辟奴隶制的反动舆论。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以博士（官名）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居然在秦始皇面前提出“师古”的主张，要求恢复奴隶社会的分封制，攻击秦朝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胡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法家著名代表丞相李斯断然驳斥了这种反动主张，并向秦始皇建议焚书，以“使天下无以古非今”。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下令烧毁了除“博士官所职”和农书、医书之外的书籍，给妄图复辟奴隶制的旧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李斯列传》。

④“客卿”，战国时，称担任本国官职的异国人为“客卿”，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就是楚国人。

⑤“剧秦”，是指秦朝的统治很短促。原语出自扬雄《剧秦美新》：“二世而亡，何其剧与（欤）！”意思说秦朝到秦二世就亡国了，何其短促啊！

⑥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统一车轨，制定规

范化的文字——小篆和隶书，还统一了赋税、货币、度量衡等制度。这些重大改革，促进了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的统一，并对以后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保持统一局面和汉字的发展具有相当影响。

⑦亚历山德府（即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在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22—285）时创立，藏书甚多。公元六四〇年阿剌伯人攻陷亚历山大城后，回教教主奥玛尔下令将藏书尽数焚毁。另一说是在公元前四八年罗马人侵入埃及时焚毁。

⑧《可兰经》，亦译为《古兰经》，回教（通称伊斯兰教）的经典，是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言行录。

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上发表署名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攻击鲁迅等的讽刺文字把人弄得“神经衰弱”，连到底要不要自由都弄不清楚，鲁迅说“到底还明白”，以示讽刺。

⑩一九三三年初希特勒上台后，积极进行德奥合并运动，奥地利的法西斯党——国社党也响应这个运动。当时奥国总理陶尔斐斯一方面压迫共产党，一方面反对德奥的合并运动，下令除国旗外禁止悬挂一切政党的旗帜，六月解散奥国国社党，禁止佩戴该党党徽，英斯白鲁地方的该党党员使用黑、红、白三色玫瑰花代替国社党的卐字标志。

秦始皇的历史功绩

——读《华德焚书异同论》

鲁迅的《华德焚书异同论》，在当前围绕着评价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问题的斗争中，值得认真细读。

鲁迅这篇杂文是一九三三年写的。当时正是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对外妄图独霸全球，对内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残酷镇压革命力量，迫害犹太人，扼杀进步文化活动，烧毁进步书刊，无恶不作的时候。希特勒的“黄脸干儿”蒋介石觉得他这一手值得效法，马上就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开动宣传机器，在官办报纸上大肆宣扬纳粹的活动，同时加紧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查禁”书刊，“究办”作者，杀害进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为了抗议德国法西斯的罪行，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鲁迅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怀着满腔义愤，写下了这篇《华德焚书异同论》和其他一系列杂文，抨击中外法西斯的暴行，特别是对蒋介石及其一伙进行严厉的鞭挞，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鲁迅在这篇杂文中，严厉地驳斥了当时某些“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的论调。他们不加分析地把希特勒烧毁进步书

刊、摧残革命力量，“比之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鲁迅指出，这些“论者们”要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有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秦始皇和希特勒这两个历史人物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两者的烧书，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

鲁迅站在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一扫两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迷雾，明确指出，秦始皇的“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是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当时中国社会正在完成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封建王朝，革新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异常激烈。代表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虽然被打倒了，但他们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反动儒生们利用各种形式，或街谈巷议，或借办“私”学，极力颂古非今，造谣惑众，其目的就是妄图破坏秦的统一，开历史的倒车，复辟奴隶主的反动统治。秦始皇与反动儒生针锋相对，断然采取了“厚今薄古”的措施，把宣传开倒车的书烧毁了，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的复辟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所以，“焚书坑儒”不但不是秦始皇的罪过，恰恰相反，正是他的历史功绩之一。至于希特勒的烧书，却完全是从维护大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为建立法西斯专政的需要出发的反动政策。他“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即反法西斯主义的书，妄图以此来巩固他的法西斯专政。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

鲁迅还列举了秦始皇“容纳客卿”、重视科学、博采

各种思想、不轻贱妇孺等等进步措施；特别是实行“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对比之下，希特勒更是“一点也做不到”。有比较才能鉴别。鲁迅正是通过这些比较，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希特勒匪徒的反动性，痛斥了独夫民贼蒋介石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一方面为秦始皇洗刷了在“焚书坑儒”等问题上长期来被一切反动派强加于他的罪名。

鲁迅写作这篇杂文的时候，尽管希特勒和他的“黄脸干儿”们烧书杀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曾几何时，希特勒和蒋介石，结果都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历史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鲁迅关于“结果往往和英雄们的豫算不同”的论断无比正确。自称“天才”、自比“天马”的林彪，跟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颂古非今，妄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他借咒骂秦始皇，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叫嚣要对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对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使他们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但是，咒骂是挽救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林彪不是也同他的祖师爷孔老二一样，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么？

谚 语^①

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象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象一个帮闲^②；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③。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所以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来，我们常常看见：武将原是练兵打仗的，

且不问他这兵是用以安内或攘外，总之他的“门前雪”是治军，然而他偏来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办学的，无论他成绩如何，总之他的“门前雪”是学务，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④，介绍国医。小百姓随军充伙，童子军沿门募款。头儿胡行于上，蚁民乱碰于下，结果是各人的门前都不成样，各家的瓦上也一团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象竟打动了贤人们的心，我记得曾有许多人絮絮叨叨，主张禁止过，后来也确有明文禁止了。不料到得今年，却又“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起来，四川的营山县长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长衣的下截。长衣原是累赘的东西，但以为不穿长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时艰”有补，却是一种特别的经济学。《汉书》上有一句云，“口含天宪”⑤，此之谓也。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象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谣谚并非全国民的意思，就为了这缘故。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的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

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为想“维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笔记罢，他们最以为奇的是什么馆里的蜡人能够和活人对面下棋。南海圣人康有为⑥，佼佼者⑦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⑧。

六月十三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七号，署名洛文。后编入《南腔北调集》。

②孙皓（243—283），三国时吴国最后的皇帝。在位时淫逸残暴，降晋后被封为归命侯，曾在宴会上为晋武帝司马炎编唱歌词，劝酒献媚。

③宋徽宗（1082—1135），名赵佶，北宋皇帝。在位时，穷奢极欲。金兵入侵，传位给儿子赵桓（钦宗），靖康二年（1127），父子同时被俘，曾被迫在金统治者的宴会上，著青衣行酒，受尽凌辱。

④膜拜，举手加额，长跪而拜，表示极端恭敬。一般专指礼拜神佛。

⑤“口含天宪”，语见《后汉书·朱穆传》。天宪，即王法。意思是封建帝王出口就是法律。

⑥康有为，参看《我之节烈观》注⑤。

⑦佼佼（jiǎo脚），美好、出众。

⑧见康有为《塞耳维亚京悲罗吉辣记》：“王宫三层，黄色颇丽，然临街，仅如一富家屋耳。往闻塞耳维亚内乱弑君后，惊其易，今观之，乱民一拥入室，即可行弑，如吾国乡曲行劫富豪，亦何难事。如以中国禁城之森严广大比之，则岂能顷刻成弑乎？”

反动谚语必须批判

——读《谚 语》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四十多年前（一九三三年）写的这篇题为《谚语》的杂文，对谚语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鲁迅通过分析谚语，对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当权者贪赃枉法，为非作歹，把中国弄得“一团糟”“不成样”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同时，对反动统治阶级如何利用谚语来蒙骗和毒害人民群众，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展群众性批判反动谚语的时候，重读此文，很有启发。

鲁迅在文章的开头就尖锐指出：“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象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一笔就戳穿了反动统治阶级把他们炮制出来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反动谚语，冒充“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的骗局。鲁迅接着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为例，以鲜明的阶级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这个谚语，其实是压迫者制造出来要被压迫者遵守的“格言”，其目的乃是“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一句

话，就是要人民群众服服帖帖听任反动统治者剥削压迫而不要起来反抗。这就是反动统治阶级制造这个谚语的罪恶阴谋。鲁迅还进一步指出，奉行这个格言，“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他们的行为截然不同，而是“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他们是统治阶级，得势凌人，可以“胡行于上”，为所欲为；他们“口含天宪”——出口便是王法，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由于这些豺狼当道，“结果是各人的门前都不成样，各家的瓦上也一团糟”，整个中国给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鲁迅又以“南海圣人”康有为无知可笑的事实，揭穿孔孟之徒编造的“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个谚语不过是个“自负的漫天大谎”。康有为，这个曾经无耻地叫嚷“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用乎？”的孔老二的狂热信徒，一次出国周游，到得巴尔干，看见王宫临街，宫墙甚矮，竟恍然大悟外国之所以那么容易发生“弑君”的内乱，原因在此。真是天大笑话！鲁迅讥讽说，“南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佼佼者”尚且如此，则一般“秀才”可想而知。所以，正如鲁迅所说，“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

鲁迅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深刻阐明了“谣谚并非全国民的意思”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在阶级社会里，“某一种人，一定只有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而歌谣谚语则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形式，所以它只能反

映某一阶级的思想愿望，而不可能反映“全国民的意思”。这就是说，歌谣谚语是有阶级性的。不管反动派怎样讳言阶级，也掩盖不了这个事实。不管反动统治者怎样把有利于剥削阶级的反动谣谚说成是“全民”的，也经不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而鲁迅，正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眼光，敏锐地看出某些谚语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实质，和反动统治者编造这些谚语企图蒙骗和毒害人民群众的险恶用心的。

孔孟之道是历代反动统治者用以进行其罪恶统治的精神支柱和禁锢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因此反动统治阶级推行孔孟之道，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们除了有大量儒家“经典”著作并以强制手段规定这些“经典”为“士人”所必读外，还炮制了通俗小册子如《三字经》、《女儿经》、《神童诗》之类，甚至编造象《增广昔时贤文》中的许多反动谚语来毒害广大群众。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宣扬孔孟之道，也是如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他那本臭名昭著的黑《修养》中，不是连篇累牍地抄录孔孟的话之外，还引用诸如“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之类的反动谚语，来鼓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自由主义，反对党的光明正大的优良作风吗？叛徒、卖国贼林彪不也是要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三番四次把它写成条幅当作座右铭，此外还编造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也就是反动谚语“一争两丑，一让两有”、“宁与千人好，莫与一人仇”的翻版，来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哲学，鼓吹不分敌我的阶级调和谬论？这真叫做无孔不入，用心良

苦啊!

在旧社会，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他们所编造的反动谚语格言，曾经使“小百姓信以为真”，流行开来，蒙骗过一部分群众。今天，时代不同了，反动派的骗术不灵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已经学会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反动谚语的反动实质及其炮制者的罪恶阴谋，全都逃不过他们雪亮的眼睛。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农兵对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谚语进行口诛笔伐，就是证明。

但是，正如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孔孟之道以及其它反动没落的思想意识，也不会因为它们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被摧毁而自行消失。由于那些经过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精心加工修饰，浸透了孔孟之道毒汁的反动谚语流传很广，流毒甚深，要肃清它们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还得用气力认真对待。让我们学习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加强对反动谣谚的批判，彻底扫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各个角落的流毒，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

礼^①

看报，是有益的，虽然有时也沉闷。例如罢，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到这一天，报上照例得有几块记载，几篇文章。但这事真也闹得太重叠，太长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过了，明年也许还可用，只要没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为反正总只能说这几句话。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会觉得沉闷，看不出新的启示来。

然而我还是看。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②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③。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歿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④，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⑤之类。新的忌日添出来，

旧的忌日就淡一点，“新鬼大，故鬼小”^⑥也。我们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旧的几个比较的不起劲，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则只好以俟将来，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⑦。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⑧，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⑨；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⑩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⑪。

九月二十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署名苇索。后编入《准风月谈》。

礼，原指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礼节仪式等，

属于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后来封建统治阶级援用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成为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一般纪念仪式也叫做礼。

②邓文，当时东北军马占山部的骑兵师长。

③三大部指《周礼》、《仪礼》、《礼记》。《仪礼》有约翰·斯蒂尔的英译本，一九一七年伦敦出版。

④仪，指礼仪，礼节仪式。

⑤按照旧社会的旧习惯，父母或祖先死亡的日子叫忌日或忌辰；死后对他们的生辰举行祝祷叫“做阴寿”。

⑥见《左传·文公二年》：春秋时鲁闵公死后，由他的异母兄僖公继位；僖公死，他的儿子文公继位。依照世序，在宗庙里的位次，应是闵先僖后；但文公祭大庙时，将僖公的位次列于闵公之前，说是“新鬼大，故鬼小”。

⑦黄老，指道家奉为祖师的黄帝和老子，以黄老治天下，指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退为进”等权谋治天下。“以孝治天下”，参看《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注⑥。

⑧以礼治天下，指以儒家用来维护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的礼教治天下。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宣扬“孔孟之道”，提倡“礼义廉耻”，妄图以此作为反革命军事“围剿”的“精神动员”和束缚抗日民众手脚的精神枷锁。

⑨“礼不下庶人”，参看《一点比喻》注⑩。

⑩见《论语·八佾》。孔丘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因见当时鲁国的国君已废去“告朔”之礼，每月初一不亲临祖庙告祭，只杀一只活羊做样子，所以他认为连羊也不必杀；但孔丘为了挽救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度，却竭力想把维护奴隶社会等级关系的“礼”保留下来。

⑪“非礼勿视……”，参看《春末闲谈》注⑫。“多行不义，必自毙”，见《左传·隐公元年》。鲁迅在这里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

“礼治”的反动实质

——读《礼》

《礼》是鲁迅批孔反儒杂文中重要的一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报》副刊《自由谈》。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魔爪正在得寸进尺地进犯我国华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则进一步加紧反革命军事“围剿”。为了配合和推行这一反革命政策，他们网罗形形色色的官僚政客、遗老遗少、反动文人，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妄图以此来瓦解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束缚抗日民众的手脚，一时搞得乌云滚滚，妖风阵阵。在这样一股逆流面前，鲁迅挺身而出，用他的杂文作批孔反儒的战斗武器，拨开乌云，迎战妖风，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天地里，投射一线阳光。

《礼》就是这许多杂文中的一篇。

鲁迅从纪念仪式上的“礼”入手，一层又一层地往深处剥，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效法孔老二“爱礼”的罪恶居心，戳穿“礼治”的反动实质。

“礼”是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和奴隶社会的视、听、言、动的规范。孔老二不是在春秋末期，“王室衰微”，“礼

崩乐坏”的时候，大动肝火，叫喊要“克己复礼”吗？可见这个“礼”正是奴隶主阶级的命根子，“复礼”就是要复辟奴隶制。鲁迅在这篇杂文中，引用《论语》上孔老二对他的学生子贡说的“我爱其礼”的说教，就是要使读者明白“礼”在孔孟之道的重要地位，从而深刻领会这篇杂文中所说的现在“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是什么一回事。

孔老二有一句“名言”，叫做“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就是说，“礼”既可以“安上”，又能够“治民”；既是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又是奴役欺骗人民的精神枷锁，一把刀子两面利。国民党反动派叫嚷什么“以礼治天下”，大喊什么“礼义廉耻”，也正是懂得了这一点。但是，孔老二的“礼治”帮不了奴隶主贵族的忙，腐朽的奴隶制终归为新兴的封建制所取代；蒋介石的“礼治”，同样也挽救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覆亡。

读《礼》，很自然地联想到那个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这个家伙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但他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三番四次念叨“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可见林彪同孔老二、蒋介石一样，也是“我爱其礼”的。孔老二用“克己复礼”作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国民党反动派要“以礼治天下”，林彪则效法“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真是牛鬼蛇神，心心相印！当然，林彪的“克己复礼”，也救不了他的反党集团覆灭的命运，他自己也早已折戟沉沙，葬身温都尔汗，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孔老二“爱礼”，国民党反动派“爱礼”，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爱礼”，可见这个“礼”很不简单，它是一切反动派的命根子。历史事实表明：一切反动派不是拚命“护礼”，就是妄图“复礼”，而一切革命派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坚决反“礼”批“礼”，把这个“礼”踩在脚底下。今天，我们更要认真学习鲁迅反潮流的彻底革命精神，坚决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彻底揭穿“礼治”的反动实质，挖掉它的根子，肃清它的流毒！

鲁迅这篇杂文的结语是寓有深意的：“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我们要彻底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复辟纲领，首先就要敢于站到批林批孔的第一线，用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挖掉孔孟之道这个一切反动派的命根子，千万不能“静静的等着别人”“自毙”啊！

吃 教^①

达一^②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貽羞往圣”^③。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④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⑤，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⑥；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⑦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⑧。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⑨，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⑩。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①。《现代评论》之出盘，不是为了迫压，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②。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盖仅由“不撤姜食”^③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九月二十七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署名丰之余。后编入《准风月谈》。

②达一，即陈子展。他的《文统之梦》一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③刘勰，参看《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注^⑦。他的《文心雕龙》序文中说他曾梦见孔丘。“貽羞往圣”，玷污古代圣人的意思。

④特操，即特定的操守，固定的信仰。

⑤《论语》和《孝经》是儒家的经典著作。《老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维摩诘经》，佛经的一种。

⑥三教辩论，古称“三教论衡”，始于北周，盛于唐代。唐德宗每年生日，令僧、道及给事中（驳正政令遗失的官员，大都是儒生）在麟德殿进行儒、道、佛三教的辩论。三教的人都以常识性的琐碎问题来应付场面，彼此没有实际的问难，相反却是强调三教“同源”“同祖”（见《白氏长庆集·三教论衡》）。后来这种辩论就杂以谐谑，弄臣甚至拿三教辩论作为笑料。鲁迅所说的“打诨”，指的是这类事情。

⑦伽蓝，梵语，即佛教寺院。

⑧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大宗派。主张不用读佛家经典，不用长期间的修行，只要觉悟到“清净”的“自性”，就可直接成佛。宋代反动理学家朱熹窃取禅宗的语言，宣扬自己的唯心主义理学。

⑨《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鹭（zhì至）文》，都是道家宣传因果报应、散布封建迷信毒素的书籍。

⑩拜忏，诵经（佛经）拜佛以忏悔罪过的一种仪式。也叫礼忏。

⑪指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倡“好人政府”的谬论。一九三〇年胡适等人又在《新月》月刊上重弹老调，目的是想参加国民党反动政府。后来就“爬”了上去。

⑫以上四句都是指戴季陶之流的国民党反动政客。戴季陶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孙中山逝世后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鼓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竭力提倡“忠孝”。后又拉拢当时的班禅喇嘛，于一九三二年屡次发起“仁王护国法会”、“普利法会”，诵经拜佛。一九三三年他在南京中山陵附近造塔收藏孙中山的著作。

⑬“不撤姜食”，参看《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注⑬。

“吃教”，自有“宜于专吃”和“宜于合吃”之别，“专吃”有如吃一碟“全鸭”，而“合吃”则有如吃一碟“杂拌儿”，如此而已。在这里，鲁迅一下子就把“被抬到吓人的高度”的孔老二的“圣人”架子打得稀巴烂，把“圣徒”们的道貌岸然扫个精光了。

在这篇杂文里，鲁迅对于孔孟之徒，有更多的解剖。他说：“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鹭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鲁迅只用这么三言两语，就揭露了自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整了早已被先进的法家思想打得惨败的孔孟之道的旗鼓以来，历经唐、宋、明、清各代的所谓儒家，不管他们装得如何“道貌岸然”，其实儒释道教只不过是一碟“杂拌儿”。连那个大名鼎鼎的孔门嫡系理学家朱熹，也不过是个禅宗（佛家）语录的窃取者。而且，他们不是把孔孟之道当作“敲门砖”，就是视为“上天梯”。鲁迅还顺带一笔，把时而尊孔，时而崇佛，时而投机“革命”的胡适、戴季陶之流，称之为“吃革命饭”的“老英雄”，使这篇杂文的锋芒，指向了历代必然以身败名裂告终的一切反动派。

林彪是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这个不知羞耻的家伙，有时声称“坚信”，有时叫喊“高举”，而在他一生的反革命言行中，却又浸透着腐臭的孔孟之道。他指使一些人大量摘抄和收集孔孟的反动言论；在他居住的黑窝里，东挂

一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西贴一张“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这不是同反共老手胡适、戴季陶之流一样，也是个“吃革命饭”的“老英雄”吗？而且也不是有时吃的是“全鸭”，有时吃的是“杂拌儿”吗？可见，鲁迅四十年前对于胡适、戴季陶这些“吃革命饭”的“老英雄”丑恶灵魂的鞭笞，也一鞭子一鞭子地直捣林彪的灵魂深处。

林彪把孔孟之道当作“敲门砖”，没有敲开他们一伙的“幸福之门”；把孔孟之道当作“上天梯”，也没有登上他们一伙的“天堂”，这只“独往独来”的“天马”，却从天上掉下来，摔死在温都尔汗！借用鲁迅在这篇杂文最末写的一句：“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因为这正是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必然的下场。

当派探员将盛金弟送往医院，由医生验明确非处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经刘毓桂推事提审，捕房律师王耀堂以被告诱未满十六岁之女子，虽其后数次皆系该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应强奸罪论，应请讯究。旋传女父盛宝山讯问，据称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责女后，女忽失踪，直至昨晨才归，严诘之下，女始谓留住被告家，并将被告诱奸经过说明，我方得悉，故将被告扭入捕房云。继由盛金弟陈述，与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余次，每次均系被告将我唤去，并着我不可对父母说知云。质之杨江生供，盛女向呼我为叔，纵欲奸犹不忍下手，故绝对无此事，所谓十余次者，系将盛女带出游玩之次数等语。刘推事以本案尚须调查，谕被告收押，改期再讯。”

在记事里分明可见，盛对于杨，并未说有“伦常”④关系，杨供女称之为“叔”，是中国的习惯，年长十年左右，往往称为叔伯的。然而《大晚报》用了怎样的题目呢？是四号和头号字的——

“拦途扭往捕房控诉

干叔奸侄女

女自称被奸过十余次

力渐厚，《礼拜六》应时势之推移，终至“寿终正寝”！惟礼拜六派之残余分子，迄今犹四出活动，无肃清之望，上海各大报中之文艺编辑，至今大都仍是所谓鸳鸯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兴文艺出版数量的可惊，已有使旧势力不能抬头之势！礼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复以《礼拜六》的头衔以相召号，盖已至强弩之末的时期了！最近守旧的《申报》，忽将《自由谈》编辑礼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一个新派作家黎烈文^⑧，这对于旧势力当然是件非常的变动，遂形成了今日新旧文坛剧烈的冲突。周瘦鹃一方面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我们只要看郑逸梅主编的《金刚钻》，主张周瘦鹃仍返《自由谈》原位，让黎烈文主编《春秋》，也足见旧派文人终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盘。而另一方面周瘦鹃在自己编的《春秋》内说：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论，也足见周瘦鹃犹惴惴于他现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时还硬拉非苏州人的严独鹤加入周所主持的纯苏州人的文艺团体“星社”，以为拉拢而固地位之计。不图旧派势力的失败，竟以周启其端。据我所闻：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

因：他平日对于选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认识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见篇即登；同时无名小卒或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则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为字纸篓的俘虏。因周所编的刊物，总是几个夹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对他的攻击日甚，如许啸天主编之《红叶》，也对周有数次剧烈的抨击，史量才为了外界对他的不满，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这次史量才的一动，周竟作了导火线，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戏还多，读者请拭目俟之。

〔微知〕

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惊小怪起来，为“守旧文化的堡垒”的动摇惋惜——

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

水手

关于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过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来又似乎渐渐抬起头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

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着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又如《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象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东方杂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自由谈》是属于《申报》的，商务印书馆与申报馆，是两个守旧文化的堡垒，可是这两个堡垒，现在似乎是开始动摇了，其余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还有几个中级的新的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一个书局，而做其台柱，这些都是著名的红色人物，而书局老板现在竟靠他们吃饭了。

.....

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为《自由谈》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

黎烈文未入文总

《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稿尤多，署名为“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一般人以《自由谈》作文者均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总中人，但黎氏对此，加以否认，谓彼并未加入文总，与以上诸人仅友谊关系云。

〔逸〕

又过了一个多月，则发见这两人的“雄图”（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

鲁迅沈雁冰的雄图

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

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做反面看，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口本身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回儿“要自由”，一回儿又“不要自由”，过一回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复去，总叫头脑简单的人弄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粗粗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拚个你死我活！”

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弄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份子又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份子偏

听说曾某年纪还不大，也并不是没有读书的机会，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种吹牛拍马的精力和那种阴毒机巧的心思用到求实学一点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吗？然而曾某却偏要日以吹拍为事，日以造谣中伤为事，这，一方面固愈足以显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见青年自误之可惜。

不过，话说回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专写三角恋爱小说出名，并发了财的张××，彼固动辄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会在一些小报上泼辣叫嚷，完全一副满怀毒恨的“弃妇”的脸孔，他会阴谋中伤，造谣挑拨，他会硬派人象布哈林或列宁，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恶辣，可说空前绝后，这样看来，高等教育又有何用？还有新出版之某无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内山书店小坐记》一文，公然说某人常到内山书店，曾请内山书店救过命保过险。我想，这种公开告密的勾当，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样。

然而无论他们怎样造谣中伤，怎样阴谋陷害，明眼人一见便知，害人不着，不过徒然暴露他们自己的卑污与无人格而已。

东洋的，西洋的，都有。阿要勿？”生意也并不清淡。上当的是初到上海的青年和乡下人。然而这至多也不过四五回，他们看过几套，就觉得讨厌，甚且要作呕了，无论你“中国的，东洋的，西洋的，都有”也无效。而且因时势的迁移，读书界也起了变化，一部份是不再要看这样的东西了；一部份是简直去跳舞，去嫖妓，因为所化的钱，比买手淫小说全集还便宜。这就使三角家之类觉得没落。我们不要以为造成了洋房，人就会满足的，每一个儿子，至少还得给他赚下十万块钱呢。

于是乎暴躁起来。然而三角上面，是没有出路了的。于是勾结一批同类，开茶会，办小报，造谣言，其甚者还竟至于卖朋友，好象他们的鸿篇巨制的不再有人赏识，只是因为有几个人用一手掩尽了天下人的眼目似的。但不要误解，以为他真在这样想。他是聪明绝顶，其实并不在这样想的，现在这副嘴脸，也还是一种“生意经”，用三角钻出来的活路。总而言之，就是现在只好经营这一种买卖，才又可以赚些钱。

譬如说罢，有些“第三种人”也曾做过“革命文学家”，借此开张书店，吞过郭沫若的许多版税，现在所住的洋房，有一部份怕还是郭沫若

落的奴隶主贵族。在鲁迅写这篇文章的年代，大念“仁爱”经的蒋介石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法西斯头子，他对抗日的工人、农民、学生和进步人士，又何尝有什么“仁爱”？自称“以仁爱之心待人”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同样是一个口是心非、凶恶暴戾的无产阶级叛徒，他对革命群众，又何尝有什么“仁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宣扬所谓“仁爱”，“人类之爱”，只不过妄想借此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抹煞阶级斗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面纱遮不住刽子手的狰狞面目，骗术更掩饰不了伪善的说教，让那些所谓圣贤的“古训”、“古法”通通见鬼去吧！

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鲁迅就这样在辛辣的讽刺中，道出了一个客观真理：在对待孔老二的态度问题上，从来就有两派。一派是尊孔的，一派则是反孔的。

根据历史记载，孔老二活着的时候是并不怎么得意的，但他死了以后为什么反而大走其运呢？鲁迅在这篇杂文里，极为透辟、生动和有说服力地揭开了这个秘密。

孟轲曾吹捧孔老二为“圣之时者也”。鲁迅把这句文绉绉的话翻成现代语，叫做“摩登圣人”。在春秋时代，孔老二及其学说原是为了复辟奴隶制、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服务的，等到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取代了奴隶主阶级，占据了统治地位，特别是到了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便又转过来利用孔老二和他的学说，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统治工具。自从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后，一切反动统治者都拚命吹捧孔老二，“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把他打扮成“万世师表”，并争相利用这个工具，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鲁迅极为深刻地指出：“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历代的反动统治者都曾借用这块“敲门砖”，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这就是秘密所在。鲁迅在这篇杂文里，具体地解剖了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这三个大军阀：“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也使人们更清楚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①

——病中答访问者，O.V.②笔录

“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漫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

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③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

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混乱。

不过，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但在批评上应用，在创作上实现，就有问题了。批评与创作都是实际工作。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所以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

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经验

——读《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发表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一九三六年。当时，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在文艺战线上则出现了以鲁迅为一方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以周扬等人为另一方的“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这篇杂文就是为了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正确立场观点，痛斥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者所鼓吹的“国防文学”谬论而写的。

这场论争，实际上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集中表现。论争的焦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统一战线中，“**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而王明、刘少奇等叛徒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取消阶级斗争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周扬等人所抛

一伙“**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的怪现象，并指出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危险倾向。毛主席的批示，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而刘少奇一伙继续对抗毛主席的批示，终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群众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两个口号的论争已经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但这场论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的路线斗争因而也就不可避免。“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必然规律。现在，王明、刘少奇、林彪一伙虽然已先后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级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要进行垂死挣扎，因此，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虽然被粉碎了，但是还会出现新的黑线；而已经被揭露和批判过的黑线，一有机会，也还会企图回潮复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历史经验，不断提高路线斗争的自觉性，保持高度的警惕，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不休战！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①

一 来 信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②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 Reds^③ 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潮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 Reds 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④。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⑤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

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⑥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 Reds 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〇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⑦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

毛主席为代表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用这一句饱含深挚动人的阶级感情的话，明确地表示出他作为毛主席领导下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同时表现了他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大信心和决心。

“能憎才能爱”。鲁迅对托洛茨基派无比憎恨，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比热爱。鲁迅从他一生的战斗经验中，深刻地认识到“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认识到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这就使得鲁迅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情况下，能够明辨是非，认清敌我，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诬蔑与陷害，一点也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呼啸着前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生动地体现了共产主义者鲁迅这种无比坚定的革命精神和无比高贵的革命品质。

毛主席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光辉报告中说：“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份努力做宣

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任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鲁迅虽然没有亲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就已经去世了，但是在他去世之前，自觉地参加了这一战斗，同托派匪徒以及破坏抗日救国运动的形形色色的敌人坚决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标志着鲁迅思想发展最高峰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当前批林批孔斗争中，在今后不断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鲁迅这篇战斗杂文都将成为我们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教材。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 统一战线问题^①

鲁迅先生：

贵恙^②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③，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④的性情之诈，以黄源^⑤的行为之谄^⑥，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

